

## 傳染病對太平天國戰局的影響\*

李玉尚\*\*

### 摘要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傳染病對太平天國戰區的軍事活動和人口究竟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現有的研究或者未能完全揭示，或者否認軍事醫史學家的共識。本文研究的目的並不僅僅是要回答上述問題，而是嘗試進一步探討，在太平天國戰區這一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到底是哪些傳染病深刻地影響了戰區的人口，又是通過何種途徑影響戰區人口？通過這一典型案例，來解釋歷史時期中國人口數量的「大起大落」的現象。

傳染病使軍隊大量減員，影響了戰爭進程，延長了戰爭的時間，特別是同治元年的霍亂流行，對戰爭的進程起了戲劇性的影響。傳染病也是戰區人口大量死亡的最主要的因素。戰爭使戰區常見的傳染病（如瘧疾、痢疾、傷寒、回歸熱等）危害加劇，但這些急性傳染病傳染性並不是特別強，病死率也不高。烈性傳染病使戰爭的烈度大大加強，只是鼠疫、天花傳染的區域有限，因而只對局部地區產生影響。古典型霍亂則顯得與眾不同，它在戰爭的後期傳入，並在戰區普遍流行，對於免疫機能已經大大下降的民眾，此一疾病產生的影響是毀滅性的。透過皖南地區的鄉老傳說，不能不讓人揣測，在造成人口銳減的重大戰爭中，一般規律就是，疫病死亡人數佔全部人口損失的70%和戰前當地總人口的40%。

**關鍵詞：**傳染病、戰爭進程、人口死亡、影響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2年11月14-16日召開的「環境史研究國際研討會」。承曹樹基先生、葛劍雄先生、梁其姿先生、李尚仁先生、康豹先生及三位匿名評審人提出諸多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03年5月21日，通過刊登日期：2004年7月22日。

\*\*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現任職中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

## 一、問題的提出

戰爭中傳染病的流行對於戰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早已為中外歷史所證明。<sup>1</sup>歷史學家近些年來的相關研究也在深入探討傳染病與中國歷史時期戰爭之間的關係。如張嘉鳳最近的研究，揭示出滿洲在征服部族、朝鮮和明朝的軍事活動中，由於採取許多預防措施，防止了天花在軍隊中的傳播，最終獲得了勝利。<sup>2</sup>巫仁恕在抗日戰爭後期的疫情與疫政的研究中，揭示了武漢保衛戰中瘧疾對戰役的影響。<sup>3</sup>軍事醫學研究的重點在於戰爭中的特殊人群——軍隊。實際上，戰爭中的傳染病不僅影響到軍隊和戰役，還對戰區甚至是非戰區的民眾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此正如普林真(Friedrich Prinzing)所說：「傳染病，不僅折磨著發動戰爭的國家，而且還隨著戰俘、返鄉的士兵和其他方面，侵入勝利者國土，可能遍佈在大片的領土上。」<sup>4</sup>中國的經驗同樣如此。曹樹基在明末鼠疫的研究當中，指出「軍隊的征戰不斷將疫情沿途傳播，形成明末鼠疫擴散的動力之一。」<sup>5</sup>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傳染病對太平天國戰區的軍事活動和人口究竟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又是如何發生作用？從 1950 年代開始，大陸醫史學家對太平天國戰爭中的疾病與醫療史的某些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研究。<sup>6</sup>他們對太平天國史的貢獻，主要在於「復原」太平天國軍隊和清軍

<sup>1</sup> 王向東在其主編的《戰爭與疾病》一書中，列舉相當多的例子，參見《戰爭與疾病》（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3）。

<sup>2</sup> Chia-Feng Chang, "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57:2(April 2002), pp. 161-176.

<sup>3</sup> 巫仁恕，〈戰爭與疾病：抗戰後期的疫情與疫政(1940-1946)〉，《中華軍史學會會刊》，期 3(1997)，頁 321-364。

<sup>4</sup> Friedrich Prinzing, *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the Wa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6), p. 1.

<sup>5</sup>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 年）〉，《歷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17-32。

<sup>6</sup> 唐志炯，〈太平天國時期之衛生工作考〉，《中華醫史雜誌》，1953 年第 3 期，頁 141-144；耿鑑庭，〈太平天國醫林人物傳〉，《中華醫史雜誌》，1954 年第 3 期，頁 176-179；耿鑑庭，〈太平天國時期的醫藥史料〉，《中華醫史雜誌》，1955 年第 3 期，頁 193-195；吳良祚，〈太平軍的衛生工作〉，《中華醫史雜誌》，1981 年第 3 期，頁 141-143；吳良祚，〈太平天國前

中的醫療體系。研究表明，太平天國軍中醫療系統是比較完善的。太平軍中疫病的「少見」，適與清軍中的疾疫流行形成鮮明對比，成為清軍腐敗的明證。醫史學家的這些研究主要停留在醫療制度層面，對於太平天國戰爭中各軍隊中軍人的染病細節則並未涉及，因而無法瞭解傳染病流行對於太平天國軍隊和戰役的具體影響。<sup>7</sup>

一般認為，太平天國戰爭對於戰區人口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有的學者提出了估算數字，如葛劍雄和曹樹基的研究表明，人口稠密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在這場戰爭中大約減少了 7,000 萬人口。<sup>8</sup>對於如此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認為：「大多數人是在逃往深山後死於饑餓的，但死於太平軍之手的男女及兒童數量也很大。」<sup>9</sup>民間百姓則把原因歸結為瘟疫盛行，如皖南花鼓戲《唐老三下江南》有這樣的唱詞：「昨日裡無事去把集趕，耳聽得眾人等講一遍……江南人兒發瘟死，全都是客家人種莊田。」<sup>10</sup>就是在華南地區，也有類似的傳說，如廣東蕉嶺縣老人們說：「戰時許多人死於瘟疫。」<sup>11</sup>這些口碑傳說，反映了傳染病對戰區人口的影響。

戰爭中傳染病所殺害的人口，遠比戰鬥來得多。然而，這一軍事醫學史家的共識，在一些歷史學者看來，或者仍是一個謎，<sup>12</sup>或者否認這一共識，認為

---

期的醫官設置》，《中華醫史雜誌》，1985年第2期，頁96-98；朱克文、高恩顯、龔純，《中國軍事醫學史》（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6），頁88。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當多，不一一列舉。

<sup>7</sup> 比如唐志炯在〈太平天國時期之衛生工作考〉一文中，指出：「這許多年來，太平軍中是否發生過大的傳染病，這是值得考慮的，但看了好多資料，卻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記載，究竟是沒有發生過呢？還是發生過而沒有記載，就不得而知。」

<sup>8</sup>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卷1，頁46；曹樹基，《中國人口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卷5，頁553。

<sup>9</sup> 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頁284-285。

<sup>10</sup> 葛慶華，〈太平天國戰後「下江南」移民的類型與動因——以蘇浙皖交界地區為中心〉，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7輯，頁259-270。

<sup>11</sup> 陳周棠，《廣東地區太平天國史料選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156。

<sup>12</sup> 王豐、李中清，〈摘掉人口決定論的光環——兼談歷史人口研究的思路與方法〉，《歷史研究》，

傳染病對於戰區人口不起決定作用。<sup>13</sup>本文的目的並不限於僅僅再次揭示傳染病對於太平天國戰區人口所產生的重大影響，而是進一步探討在太平天國戰區這一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到底是哪些傳染病深刻地影響了戰區的人口，又是通過何種途徑影響戰區人口。在同時期雲南的回民戰爭中，根據當地人的觀察和人口數字推算，戰爭中鼠疫死亡人口遠大於其他各種死亡原因。李玉尚和曹樹基據此推論：「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雲南、西北地方的回民起義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太平天國戰爭，以及戰爭中的瘟疫、饑荒，造成了中國 1 億人口的死亡。從雲南、皖南的情況看，死亡人口的大部份死於瘟疫，而非其他原因。」<sup>14</sup>雲南存在著鼠疫自然疫源地，戰爭引起鼠疫的擴大流行，從而導致人口的大量死亡，易於理解。由於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用雲南的例子來推論太平天國戰區並不合適，對於太平天國戰區的傳染病史的研究更需要進一步加強。謝高潮指出，同治初年，蘇、浙、皖交界地區的疫災，包括瘧疾、傷寒、痢疾，以及古典生物型霍亂(Classical Biotype Cholera)等多種疾病。<sup>15</sup>儘管這一研究深化了太平天國戰爭與疾病關係的認識，但對於該地常見的傳染病以及古典生物型霍亂，對於戰役和軍隊產生多大程度的影響，仍未能完全揭示。因而對於戰爭中傳染病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具體原因，還需要做一闡釋，並從發生學上去揭示戰爭中人口大量死亡的主因，也為解釋歷史時期中國人口數量「大起大落」的現象，提供一個典型案例。

總之，本文通過對於太平天國史料的重新發掘和解讀，從傳染病流行的角度，重新審視太平天國軍事史，並進一步揭示戰爭中的傳染病流行機制，對於

---

2002 年第 1 期，頁 58。

<sup>13</sup> 余新忠根據當時文人的記載，對太平天國戰爭中江南地區傳染病人口死亡數字進行估算。他的估算存在著兩方面的問題：文人描述的傳染病死亡人數是否可靠？即使是可靠的，在計算傳染病死亡人口比例時，考慮到戰爭中人口大量流亡，戰時某地的人口數字並不能根據和平時期的人口數字來計算。因而筆者認為余新忠對於戰爭中傳染病死亡人口的比例估計偏低。參見余新忠，〈清代江南瘟疫對人口之影響初探〉，《中國人口科學》，2001 年第 2 期，頁 36-43。

<sup>14</sup> 李玉尚、曹樹基，〈咸同年間的鼠疫流行與雲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31。

<sup>15</sup> 謝高潮，〈淺談同治初年蘇浙皖的疫災〉，《歷史教學問題》，1996 年第 2 期，頁 18-22。

戰區人口的大量死亡，作出更為細緻的分析和說明，以期更為全面且深刻地理解這場戰爭，以及這場戰爭所包涵的可稱為「天生的悲劇」的內核。

## 二、傳染病對戰爭和軍隊的影響

在十九世紀以前的戰爭中，軍人死亡的主因是疾病。國外公認因病死亡與戰鬥死亡的比例是 4：1，許多戰爭常常超過這一比例。一些重要的傳染病，如斑疹傷寒、痢疾、傷寒、古典型霍亂、鼠疫、天花等，在十九世紀末以前的戰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時對戰役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sup>16</sup>

戰時軍隊的疾病減員（即因疾病導致士兵不能進行正常的軍事活動）具有地區性特徵。欲對太平天國戰區中軍隊疾病構成有一個初步的瞭解，1951-1956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部隊發病率可供我們參考，其情況如表 1 所示。

表 1 南京軍區 1951-1956 年部隊發病率(‰)

年份	傳染病	傷寒副傷寒	流腦	痢疾	乙腦	瘧疾	食物中毒
1951	81.09	0.19	0.12	18.28	0.03	54.94	5.02
1952	79.69	0.09	0.04	16.09	0.02	53.94	8.53
1953	51.21	0.18	0.03	10.93	0.02	27.07	9.23
1954	77.45	0.10	0.01	20.19	0.01	47.69	6.51
1955	78.00	0.05	0.03	25.7	0.02	42.19	5.75
1956	57.25	0.05	0.05	24.79	0.02	25.03	4.84

資料來源：石文光，《南京軍區衛生工作 40 年(1949-1989)》（內部印行本），頁 107。

據表 1，在 1951-1956 年南京軍區部隊發病率統計中，痢疾和瘧疾的平時發病率遠遠高於其他疾病，成為平時疾病減員的最主要疾病因素。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瘧疾和痢疾的發病率最高，因此，部隊中的疾病構成與該地居民中的疾病構成是一致的，我們可以從戰區流行的疾病去推測軍隊中發生的疾病種類。

<sup>16</sup> 王向東，《戰爭與疾病》，頁 11、51。

二十世紀中葉南京軍區的軍事醫學資料，除了為我們瞭解歷史時期該地區軍隊疾病構成提供參考之外，還提醒我們注意軍隊中士兵的來源與發病率的關係。如 1949 年北方部隊渡江南下，南京軍區全區部隊瘧疾發病率為 40%，其中江南部隊為 60%，個別部隊高過 80%。渡江部隊感染其他常見病也十分嚴重，1949 年絲蟲病感染率一般在 2%-5%，血吸蟲病達到 30%-50%。<sup>17</sup>從 1949 年的例子可以看出，當一個地區的軍隊進入陌生地區時，其發病率會大幅提高。

最初的太平軍由廣西桂平、武定、貴縣、平南等地的貧苦農民組成，在進攻桂林時，人數有五、六千。進入湘南時，又有 5 萬多人加入，這些人成為後來席捲江南以至北伐、西征的主力軍。天京事變後，太平軍從江西和安徽招募數十萬人入伍。咸豐十一年(1861)，又在湖北興國、大冶、鄂城等地招收 30 萬人，這批軍隊後進入浙江作戰。湘軍最初的將領和士兵主要來自湘鄉，戰爭中不斷從湖南補充兵源。如同治二年(1863)，圍困南京的湘軍，「每營已病故者百餘名不等，業已設法往湖南招募添補。」<sup>18</sup>清朝的主要軍事力量——綠營，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也從外省徵調額兵。<sup>19</sup>江南大營軍隊，就是由從廣西一直追擊太平軍至南京的綠營軍隊組成。李鴻章的軍隊，最初來自安徽安慶地區，以後又在江淮、湖南招募軍隊。自桂、湘、鄂、皖、贛的軍隊進行跨省區軍事移動，進入新環境的士兵極易感染當地常見病。咸豐八年(1858)，進入江西建昌府的曾國藩軍隊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

咸豐八年，曾國藩派「定營」、「寶營」和「楚勇」進入江西建昌府，來自外省軍隊感患疫病極重。在一封家書裡，曾國藩描述了軍隊中的患病情況：「營中勇夫病者極多，張（凱章）軍之不能從行，建昌養病者至八百人之多，蕭（浚川）軍亦復不少，吳翔岡所帶千三百人病者至四百人，建昌知府、知縣

<sup>17</sup> 石文光，《南京軍區衛生工作 40 年(1949-1989)》（內部印行本，1993），頁 88、91、97、107；石文志、伏斟，《解放戰爭時期華東部隊衛生工作簡史》（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86），頁 179-181。

<sup>18</sup>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北京：中華書局，1962），冊 6，頁 317。

<sup>19</sup> 軍隊的來源，參見羅爾綱，《困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450-455、457、439。

皆病，委員中病者亦層見疊出。」<sup>20</sup>在向福建進軍途中又有疾病發生，「此間張凱章於廿四日拔營，初六日始入杉關，度關後勇夫又病百餘，前留病者八百餘人，在建昌調養拔營後，又病者三百餘。吳翔岡營病亦極多，印渠楚勇病者至十之八，死者五百有奇，頃自新城拔回建撫調養，不復成軍，實無良法治之。」<sup>21</sup>在給郭筠仙的信中，曾國藩提及部隊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張凱章所部三千七百人，病者千零數十，吳翔岡所部千三百人，病者四百有奇，劉印渠所部四千人，病者千餘，故者將近五百。」<sup>22</sup>這些數字涉及的是軍事機密，不會有所誇大或者縮小。據此，三支軍隊發病率分別為 27.3%、30.8%和 25%，劉印渠部隊的個案死亡率近 50%。又是何種疾病導致了如此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呢？曾國藩云，張蕭各軍，「半係瘧疾」。<sup>23</sup>痢疾也當有發生，在給蕭浚川的信中，他提醒要注意軍隊飲水衛生：「軍行以來，泉甘潔為最難得之境，章在資福橋泉水清美，營中病者立見痊癒數十人，未病者即不復發。……其無活水清泉之處，不可駐也。」<sup>24</sup>

從當時行軍書所涉及的内容來看，同治年間，為數眾多的將領並未意識到軍隊中防疫事務的重要，即使是意識到了，也並無良法進行處理，<sup>25</sup>因而軍隊中傳染病發病率相當高。在 1950 年代的科學實驗中，利用中醫中藥治療瘧疾、細菌性痢疾及其他常見急性傳染病，有相當明顯的療效。<sup>26</sup>不過從文獻的記載來看，現代看來簡單易治的瘧疾和痢疾，在當時卻很難治療。太平軍將領王誥在給其同僚金逸亭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於前月初偶感風寒，變為疔瘡」，醫者「惟清脾、截瘧等劑與服」，其效果卻並不明顯，而且還有很大的副作用。

<sup>20</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 6，頁 19733-19734。

<sup>21</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 6，頁 13537。

<sup>22</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 6，頁 13531。

<sup>23</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 6，頁 19732。

<sup>24</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 6，頁 13534。

<sup>25</sup> 清軍中行軍章程，參見黃秩冲，《行軍臆說》（虔州：出版者不詳，1872）；太平軍參見《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編，《中國兵書集成》（北京和瀋陽：解放軍出版社和遼瀋書社，1992），冊 47。

<sup>26</sup> 浙江省衛生廳編，《浙江省中醫藥臨床經驗彙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第 1 輯；上海衛生局編，《中醫中藥臨床實驗彙編》（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8），第 1 輯。

一個月後，他的病情加重，他將原因歸於「此間醫士絕陋，雜藥亂投，不能奏效」。他認為「營中人材匯萃，當有精於此道者」，故而請金逸亭派軍中醫生前來。<sup>27</sup>從長洲人徐佩璠的記載中也可證明，其兄「前因患瘡告假回寓，迄已多日尚未痊可。」<sup>28</sup>腸道傳染病也並不是能夠輕易治好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三十日，南匯人錢裕「患清瀉嘔逆，似是霍亂」，延醫治之，「瀉仍未止」。九月一日，南匯人邵子齡之母「昨晚病故，云似起霍亂（筆者按：此指腸胃傳染病，非特指古典型霍亂），醫者飲以西瓜汁二碗，脈遂服，他醫雖用回陽之劑，亦無及矣。」<sup>29</sup>江南地區主要流行的是阿米巴痢疾，這種痢疾病死率並不高；細菌性痢疾雖然發生少，但病死率高，一般為 20% 左右。<sup>30</sup>江南地區瘡疾主要是良性的三日瘡和四日瘡，病死率低，但戰爭條件下其病死率會增高。

戰爭中來自他地的士兵體質下降，傳染病的危害加強，發病率和死亡率都會大幅提高，但劉印渠軍隊個案死亡率如此之高，不大可能完全由瘡疾和痢疾引起，可能是軍隊感染了一種病死率相當高的傳染病，這種傳染病「實無良法治之」，故而「死者五百有奇」。

疾疫流行使曾國藩對於戰局做了重新估計。他說：「賊之死於饑餓，死於疾疫者，沿途狼藉。官軍病者亦極多……死喪之威，不寒而慄，此鄙人從軍以來所未歷之景象也。俟冬令氣斂，或當以次痊癒，閩賊勢將極散漫，氣已衰落。現派張軍由杉關入，蕭軍由廣昌石城入。倘病卒漸愈，閩事或尚易於勾當。」<sup>31</sup>從入贛、閩之師的大量染病中，他注意到軍隊進入陌生地區，往往會遇到可怕的傳染病，在給湘軍將領李迪庵（李繼賓）的一封信中，他就提到：「不知湘勇至舍予以北，尚服水土否？無疾疫否？此間入閩之師病者甚多，極焦灼也。」<sup>32</sup>

咸豐十年(1860)之前，太平天國戰爭的主要戰場是湖廣、江西和南京。上

<sup>27</sup> 中華文史論叢編輯部編，《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460。

<sup>28</sup> 徐佩璠，〈雙鯉編〉，《近代史資料》，1964 年第 1 期，頁 65。

<sup>29</sup> 張文虎，《張文虎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56。

<sup>30</sup> 陳方之，《傳染病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50），頁 177。

<sup>31</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 6，頁 13531。

<sup>32</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 6，頁 13538。



述江西建昌府的例子已可證明傳染病對於戰役和軍隊的影響。咸豐十年之後，太平天國戰爭的主要戰場轉移到皖南、浙江和江蘇。咸豐十年秋，太平軍開始第二次西征。由於受湘軍阻截，楊輔清部和李世賢部未能進入湖北，李秀成部於第二年六月九日才進入湖北境內，後來又撤回浙江。從上游合圍湖北計畫的失敗，使得安慶局勢日益危急。五至八月間，太平軍進行了四次大規模進攻，但均告失利，安慶終於九月五日被湘軍攻陷。<sup>33</sup>從軍事醫學的角度來看，第二次西征發生在雙方軍隊疫病發生較少時節，因而傳染病對戰爭影響並不大。太平天國戰爭中對軍隊影響甚大的瘧疾和痢疾，雖然全年均可發病，但以夏秋為主。春冬兩季軍隊多發生呼吸道傳染病、流行性斑疹傷寒和回歸熱等疾病。<sup>34</sup>從文獻記載來看，和夏秋兩季相比，春冬兩季流行的傳染病對軍隊的影響並不是特別大。如南京的湘軍，「入秋後，病勇當漸瘥。」<sup>35</sup>因而，當雙方軍隊因發生大規模傳染病流行，而造成軍隊大量疾病減員之後，戰爭往往進入間歇期；待秋冬季到來之後，開始謀劃新的戰鬥；如果雙方在傳染病多發時節採取軍事行動，他們不得不面對傳染病流行帶來的損兵折將。

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曾國藩坐鎮安慶，策劃進攻南京。利用疫病少發的冬季，湘軍開始休整隊伍，招募新勇。第二年春，湘軍分十路，對以天京為中心的太平軍佔領地發動全面攻勢。經過休整的湘軍戰鬥力很強，「該司從前進兵時勇力強壯，尚能戰守。」<sup>36</sup>由於戰爭進行地相當順利，時人認為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同治二年，曾國藩在給金竹虔的一封信中，也說：「自辛酉秋至壬戌夏，軍事頗順，論者以為廓清有期。」然而，同治元年(1862)七月之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逮六月間秦中回變，多軍西行。七月以後大疫遍作，

<sup>33</sup> 本文對太平天國後期軍事的論述，引自張一文，〈太平天國後期戰爭的戰略問題〉，收入廣東太平天國史學會和廣西太平天國史學會編，《太平天國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頁398-422。

<sup>34</sup> 王向東，《戰爭與疾病》，頁24-25。

<sup>35</sup> 吳汝綸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頁307。

<sup>3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冊24，頁582。

士卒十喪四五。自是賊氛彌熾，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sup>37</sup>在翌年給劉霞仙的信中，他對同治元年秋天開始的疾疫仍然心有餘悸，他說：「去年春夏事機頗順，秋冬以來，奇險環生，至今尚在驚濤駭浪之中，尤可痛者，疾疫物故萬有餘人，其中良將循吏有裨時艱者，動折十餘人。」<sup>38</sup>這次疾疫來勢洶洶，原來是古典型霍亂開始肆虐。只是霍亂嚴重程度，各戰區情況不一。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一封信中提到：「疾疫之多，霆軍爲最，金陵次之，貴軍（左宗棠）與徽、旌各軍又次之，水師雖多病而死亡較少，希軍則病亦較少。」<sup>39</sup>值得注意的是，水軍發病率高，死亡率卻低，原因可能在於所患疾病主要是痢疾等一般腸胃病。

先來看同治元年在皖南和南京戰場上湘軍的情況。在一份奏摺中，曾國藩描述了這年皖南傳染病流行對軍隊和戰爭的影響：

大江南岸各軍疫疾盛行，臣於八月二十九日附片具奏在案。近日秋氣已深，而疾病未息，甯國所屬境內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師及上海、蕪湖各軍亦皆癘疫繁興，死亡相繼。鮑超一軍，據初二日開單稟報，除已痊外，現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數千，尚未查得確數。甯國府城內外屍骸狼藉，無人收埋。病者無人侍藥，甚至一棚之內，無人炊爨，其軍中著名將領如黃慶伍、華瀚等先後物故。鮑超亦染病甚重，合營將領因其關係至大，一面稟明臣處，一面用舟送鮑超至蕪湖養病。張運蘭一軍駐紮太平、旌德等處，病者尤多，即求一繕案之書職、送信之夫役亦難其人。張運蘭送其弟之木親至祈門，亦自患病，尚難回營。皖南道姚體備至嶺外查閱一次，歸即染病不起。臣派營務處四品卿銜甘晉至甯國一行，現亦染病回省。楊岳斌自揚州歸來，亦抱重病。天降大戾，近也罕聞，惡耗頻來，心膽俱碎。若僕

<sup>37</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20，頁14882。

<sup>38</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20，頁14835。

<sup>39</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19，頁14716。

再犯金陵、徽州，恐病者太多，戰守皆無把握。<sup>40</sup>

在南京也有類似的情形，「不意夏秋以後疾疫流行，每營病故八九十名，勇病日多，其無病者不過一二成隊。似此光景，不惟難以制賊，即自守亦無把握。」不僅大量士兵染疫，湘軍將領和地方官吏死亡甚多，曾國藩說：「本年夏秋以來，疾疫繁興，數百里內軍營將士、地方官吏，嬰疾輒殞，殆以萬計。其中功績卓著，未竟所用，遽至徂謝者有九十六員名之多。」<sup>41</sup>疫病傳染極速，湘軍各股軍隊普遍染疫，各軍無法相互馳援，曾國藩對此極為憂慮。他在一份奏摺中提及：「鮑超軍士疾病死亡相藉，勢不能速離甯國，且恐為偽侍王等牽制，或為偽忠王橫截其間，與金陵隔絕。該司深入危地，不可孤立無援，倘賊環至，亟肆疲我，病軍不能禦強寇，南岸別無援師，支援日久，何堪設想！」為應付這種危急局面，他請求「奏調多隆阿折回，渡江會剿，俾軍心有可指望。」<sup>42</sup>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同治元年的疫病流行使湘軍失去了戰鬥力，由此出現「戰守皆無把握」的不利局面。這個時候，正是太平軍發動反攻，消滅皖南和南京的湘軍，進而收復安慶，扭轉岌岌可危的戰局的絕好時機。然而，在南京和句容的太平軍也發生了嚴重的疫病流行。由於軍隊發生傳染病屬於機密，故而甚至連清廷和曾國藩也並不清楚太平軍中是否有疫病流行，只能從「各軍營疫氣傳染若此之甚，居民間亦不少」中，推測「諒賊匪亦難倖免」。<sup>43</sup>這種推測是有道理的。清軍截獲的一份太平天國文書，透露了太平軍中疫病流行情況。這份文書登載在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日的《上海新報》上，內稱：「況上游殘妖十分厲害，昨由四州調回天京官兵，在上游一帶失落不少，病者亦多，一時難以禦敵，均填老館守城，現奉大王旨意，蘇城務要加意堅守，萬不可稍有疏虞，……又聞江南句容一帶，賊匪大發瘟疫，死者甚多。」從周邊地區調回的士兵，逃跑和病者甚多，故而只能「均填老館守城」。由此可見，守衛南

<sup>40</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冊 24，頁 558。

<sup>41</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17，頁 2901。

<sup>42</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冊 24，頁 554-555。

<sup>4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冊 24，頁 575。

京的太平軍不僅無力進攻已經受到疫病致命打擊的湘軍，而且還要從各地調兵，拱衛南京的安全。

鎮守蘇州的李秀成，因掌握軍隊甚眾，故而洪秀全多次嚴詔，令其帶兵入南京，補充因病減員的士兵。李秀成遲遲未能動身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在於江浙各路太平軍發生傳染病流行。同治元年，蘇州有劇烈的古典型霍亂流行，有記載稱：「賊禁食西瓜。夏秋之交，大瘟疫，忠曾書記某食西瓜後染瘟疫死，故禁食之。」<sup>44</sup>駐守各地的其他軍隊也有疫病發生，甚至到了無法堅守的地步。如在八月，清軍截獲了鎮守嘉定城之太平軍首領給李秀成的一份文書，《上海新報》登載了這份文書的大體內容，據云：「奉令來守嘉定，已經數月，無不盡力堅守，但現在各館新舊兄弟自前月至今，病故不少，尙有病纏者更多，每日出師，兄弟甚寥，誠恐西兵大隊進攻，實難禦敵，請僞忠王之子索商忠王，若無按兵可發，即請准其退守蘇城，再為設法。」<sup>45</sup>實際上，太平天國佔領區傳染病流行都相當嚴重。同治元年閏八月間的一份記載稱：「各處賊瘡痍及瘟疫大發，死者無算，並戰死頭目亦無計，又各廟神佛顯聖，賊祈禳之，無效。」<sup>46</sup>太平軍本來是禁止神佛之類的信仰的，此時將領們因為相信牠們能顯聖，故「祈禳之」，反映出對此疫的無奈。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也認為：「就道地的太平軍人數而言，他們的力量一直為人所過於誇大，而且目前，由於不斷的戰鬥，以及本年夏季因發生霍亂(按：原文為“serious diseases”，筆者同意譯者的譯法，該疾病應該就是霍亂)，這種致命的疾病所造成的死亡，太平軍的戰鬥人員及其首領的數目，已比去年大為減少。」<sup>47</sup>

在天王的嚴詔之下，各路軍隊紛集南京。太平軍似乎知道了湘軍中疫病流行嚴重，故而分幾路向湘軍發起了進攻。曾國藩對此甚為憂慮，他在八月份的

<sup>44</sup> 廖村遁客，〈虎窟紀略〉，收入中華文史論叢編輯部編，《太平天國史料專輯》，頁42。

<sup>45</sup> 《上海新報》(上海)，1862年9月1日。

<sup>46</sup> 馮氏，〈花溪日記〉，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冊6，頁707。

<sup>47</sup> 《北華捷報》，1862年12月13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393。

一份奏摺中分析了戰爭的局勢，他說：「又據左宗棠咨，偽侍王將由浙境赴援金陵，自甯國、廣德決戰而往，群賊將萃於皖南，而鮑超營中疾疫大作，勇夫病者萬餘人，死者數十人，張運蘭、朱品隆、良義訓各軍六千人，而病其六七。張運蘭之胞弟張運桂亦已病故，即去臘堅守徽州，苦戰得全也。曾國荃金陵營中病者亦逾萬數，……左宗棠軍中病者過半，每次出隊不滿五成。若秋間有大股惡戰，深恐羸卒不足禦強寇。」<sup>48</sup>九月十二日，曾國藩上奏了另一份軍情，內云：

李秀成率十餘萬賊更番猛撲雨花臺營盤，自閏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初六，晝夜不息，洋槍、洋炮子密如雨，並有開花炸炮打入營中，驚心動魄，曾國荃於二十九日至九月初傷……又據蔣益澧來稟，偽侍王李世賢於前月十四日帶賊三四萬由浙赴援金陵，我軍以病餘之卒苦守十六日夜，疲乏已極，若再添侍逆一股，殊恐難支。此金陵之可慮也。黃、胡諸逆之竄犯甯國者，自前月二十日我軍小挫後，未遽攻撲郡城，盤踞於廟埠、仰賢圩、油榨溝、新河莊等處，綿互近百里。疊據逃出及捕獲匪黨供稱，該逆不得逞於甯國，決計繞竄南陵、青陽，上犯江西。目下各營病勇未痊，缺額未補，即能竭力保守寧郡，而無陸師駐防，該逆若由間道上趨，不能分兵堵截。此甯國之可慮也。<sup>49</sup>

儘管湘軍和左宗棠軍隊中疾疫流行嚴重，但戰爭並沒有呈現出一邊倒的局面，卻進入了相持階段。上面的論述已經指出，其原因在於太平軍中也發生了相當劇烈的傳染病流行，從而使軍隊的戰鬥力大大減弱。1863年《北華捷報》在對上一年的回顧中，這樣評論道：「這時（1862年），極為酷熱的暑期已告開始，一連串的疾病與死亡也隨之俱來……這年傳染病流行之盛是前所未見的，且與在外國僑民界中一樣，霍亂與痢疾也在本地人中蔓延著。這種疾病的流行並不限於這一個地區，凡是太平軍佔有優勢的各省，也受到同樣的損害。」

<sup>48</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冊24，頁582。

<sup>49</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冊24，頁597。

因此，傳染病流行使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這種使人苦惱的暑熱與疾病的影響是如此巨大，致使雙方不得不連續休戰幾個月的功夫。」<sup>50</sup>徐佩璠也說：「同治元年，金陵疫氣大作，相持而已。」<sup>51</sup>當天氣漸漸寒冷，疫氣逐漸消失後，在各地調來的救援軍隊的配合下，湘軍又奪回了戰爭的主動權。未帶冬衣、缺兵少糧的太平軍救援南京部隊，面對著「縮營自保」的湘軍，不得不主動撤退。

李秀成因同治元年救圍不成，被洪秀全「嚴責革爵」。為救援南京，不得不在皖北作戰，但處處受阻，至同治二年五月間，他被迫返回南京。趁李秀成北上之際，常勝軍和李鴻章領導的淮軍開始進攻蘇南太平軍佔領區，1863年蘇州保衛戰成為太平天國戰爭後期的重要戰役。蘇州保衛戰可分為週邊戰（1月17日至7月29日）、大會戰（6月18日至11月23日）和城防戰（8月27日至12月4日）三個階段。<sup>52</sup>從作戰時間來看，戰鬥主要發生在疫病多發季節，因而，戰爭中軍隊傳染病流行甚劇。

常勝軍前期士兵來源為外國的失業軍人；至後期，中國士兵成為這支軍隊的主體。軍隊中醫療設施比較完善，上海道台吳煦在一份奏摺中說：「常勝軍向設病房，凡遇勇丁小有疾病，即送病房醫治，每月所費不下數千兩。」這種軍隊醫療使一向對常勝軍不滿的李鴻章更加不滿，他主張「嗣後（同治元年）如係打仗受傷之勇，照官兵例酌給養銀兩，病房應即裁去。」<sup>53</sup>最終的結果雖然無從得知，但從西方軍隊一直非常注意軍事醫學推測，他們不會按照李鴻章的要求去做的。在常勝軍出征時，「民船變成飄浮的醫院，上面有供應糧食的人員，因此凡在行軍中因病掉隊的人，隨時可以送到水上醫院，故自出征部隊離上海後，對士兵疾病的處理猶如留在上海一樣。」<sup>54</sup>即使如此，軍隊士兵染

<sup>50</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448。

<sup>51</sup> 徐佩璠，〈雙鯉編〉，《近代史資料》，1964年第1期，頁40。

<sup>52</sup> 錢正，〈論太平天國蘇州保衛戰〉，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太平天國史研究室編，《太平天國史新探》（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頁225-247。

<sup>53</sup> 靜吾仲丁編，《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頁139。

<sup>54</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397。

病仍然相當嚴重。在 1863 年 4 月 1 日至 1864 年 5 月 31 日的 14 個月中，統計在常勝軍裡中國人員的各種病症和死亡率，如表 2 所示。

表 2 1863-1864 年常勝軍裡中國人員的各種病症和死亡率

病症	發生	死亡	病症	發生	死亡	病症	發生	死亡	病症	發生	死亡
痢疾	54	7	間歇熱	1,755	8	氣管炎	25	0	蜂窩組織 炎、潰瘍	99	2
泄瀉	690	9	弛張熱	1,247	48	初期梅毒	6	0	各種傷害	138	2
霍亂	2	2	持續熱	67	8	疥癬	66	0	其他	17	1

資料來源：王吉民、趙士秋，〈太平天國期間在清廷雇傭軍裡的兩個外籍軍醫〉，《中華醫史雜誌》，1955 年第 1 期，頁 29。

據表 2，間歇熱和弛張熱是最為普遍的疾病。「間歇熱」和「弛張熱」應為瘧疾，為 3,002 例，另外一種重要的疾病是腸胃傳染病，包括痢疾和泄瀉，共有 744 例，兩者分別佔全部病例數的 72.1%和 17.9%。對照表 1，常勝軍的疾病構成和表 1 基本上是相同的。戰爭期間江南地區民眾所患的疾病，主要為瘧疾和腸道傳染病（下文論及），民眾所患疾病和常勝軍也具有一致性。1950 年代軍隊和居民所患疾病，可以與太平天國戰爭期間軍隊和民眾所患疾病互相印證。

吳煦在一份奏摺中提到常勝軍的人數，同治元年十一月，「查松江原有常勝軍，連寧波調回各勇暨職員周志鴻管帶之九畝地洋槍隊，並計洋槍隊勇數，實共五千六百餘名，除帶赴金陵四千名外，共計留守松江勇丁一千六百餘名」，這年李鴻章主張削減常勝軍的人數，「以三千為度」。<sup>55</sup>以 3,000 人計算，14 個月中，感患瘧痢的有 3,746 人，一年之中每名士兵會感染一次瘧痢；若以 5,600 人計算，則一年之內有 70%的士兵感染這兩種疾病。戰爭中軍隊疾病減員的一般規律是，戰爭初期和長時期戰鬥的後期疾病減員多。1863 年常勝軍參與了對太平軍的戰鬥，因而疾病減員比平時多，這年 10 月 24 日，常勝軍統帥白

<sup>55</sup> 靜吾仲丁編，《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頁 138。

齊文(Henry Andrea Burgevine)也說：「手下的軍官和士兵又大半受傷和患病。」<sup>56</sup>常勝軍的發病率比上述曾國藩派往建昌府的軍隊要高得多，可能的解釋是，曾國藩軍隊中所統計的病例數只是那些具有典型症狀的患者。因而常勝軍對軍隊中的疾病統計遠較湘軍完整，反映了太平天國戰爭中軍隊感染疾病的真實狀況。但其死亡率要低的多，這一方面與兩支軍隊的防疫與治療效果不同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與曾國藩的軍隊遇到某種病死率高的傳染病有關。

表 2 中需要解釋的是常勝軍霍亂的發病人數。同治二年江南地區仍有霍亂流行，但常勝軍古典型霍亂患者僅 2 人。古典型霍亂很有可能被誤診成痢疾或泄瀉，但在 744 例病人中，只有 16 人死亡。直至 1908 年，用鹽水注射和過錳酸鉀內服，霍亂患者的死亡率才從 70% 降至 11%。<sup>57</sup>從痢疾和泄瀉死亡率極低來看，古典型霍亂不可能被誤診。常勝軍中所患古典型霍亂人數少，一方面與軍隊中採取比較有效的防疫措施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是年江南地區的霍亂並未發生區域性的大流行有關。

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無法確知太平軍中疫病流行的細節，但從李鴻章給曾國藩的信中，仍可看出傳染病對太平軍和戰爭的影響。李鴻章在信中說：「忠逆（李秀成）聞金陵緊急，又已西去。……蘇賊軍士疫死者甚多，暫難進攻。」<sup>58</sup>疫病流行使駐紮在蘇州的太平軍死亡甚多，故而李鴻章認為暫難進攻，以免軍隊亦感染疫病而影響軍力。

在浙西戰區，這年左宗棠由安徽進攻浙江，攻佔開化與遂安，並進援衢州。傳染病再次在軍隊中盛行；和去年相比，這一年的疫情格外嚴重，「軍士積勞之後，疾疫繁興，瘡、痢兩門尤甚，從前軍中夏秋之際往往有之，然未至如今茲之酷。」<sup>59</sup>在受染的士兵當中，「新募來浙勇丁染患尤甚」。<sup>60</sup>「瘡痢」是如此盛行，以致於左宗棠也不能倖免，「弟自五月中旬以後，即患瘡疾，數日

<sup>56</sup> 王崇武、黎世清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第 1 輯，頁 83。

<sup>57</sup> 陳方之，《傳染病學》，頁 276。

<sup>58</sup> 吳汝綸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頁 287。

<sup>59</sup>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批劄》（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卷 1，頁 3619。

<sup>60</sup>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 6，頁 243。



內始就霍然。」<sup>61</sup>杭州將軍伊勒東阿於這年六月經由衢州至嚴州，「因嚴州疫癘繁興而衢州尚稱平善」，左宗棠「勸其暫回衢城，藉資調養」，然而，「八月中旬以後，衢城疫氣又起，城鄉染患者多，伊勒東阿復患瘧疾，損食失眠，自覺困憊。」<sup>62</sup>瘧痢流行嚴重影響了左宗棠的軍隊，在一份奏摺中，他說：「臣所患瘧疾已半月未發，而營中將士及地方印委各員，仍多染疫氣物故者。移駐新城、分水各營亦然。節交霜降，疫氣仍未衰減速，殊為憂煩。」<sup>63</sup>瘧痢流行打亂了他規復浙西三郡的計畫：「浙西三郡早應規復，因前此炎熱甚，軍中疾疫繁興，未能如願。」<sup>64</sup>

圍困南京的湘軍因無法阻止軍隊中疫病肆虐，使攻佔南京的日程大大延緩。同治二年，「金陵大營疾疫又作，死亡相繼，鮑公已在鐘山修壘，因病者太多，又平毀之。」<sup>65</sup>鮑超在給黃翼升的一封信中，詳細描述了湘軍的患病情況。他說：「現在門生所部，因開差日久，一未息肩，雖紮金陵神策門外，直逼城根，而氣炎威，挑挖濠牆，受暑過重，各兵勇染患瀉症、霍亂、燒熱、瘧痢等症不少。半月之間，每營已病故者百餘名不等，業已設法往湖南招募添補。查今年病痛似於去年甯國時更甚。」<sup>66</sup>信中提到的「霍亂」，中醫指一般的急性腸胃病，並不特指古典生物型霍亂。「瀉症」與痢疾也都屬於腸道傳染病。惡性瘧疾的典型症狀是每 1 至 2 日發作一次，或呈現持續發熱，因而「燒熱」病中的一部份當是惡性瘧疾。大量湘軍因病死亡，以致於不得不到湖北去添募新勇。

同治三年，圍攻南京的湘軍情況依然如我。曾國藩在奏摺中說：「自五月三十日攻破地保城後，連攻十五晝夜，但出行隊，未支帳棚，晝則日灸，宵則露處，又出入地洞之中，面目黧黑，雖與臣最習之將，相見幾不相識。其論功

<sup>61</sup>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書牘》，卷 6，頁 2874。

<sup>62</sup>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 7，頁 271。

<sup>63</sup>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 7，頁 273。

<sup>64</sup>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書牘》，卷 6，頁 2875。

<sup>65</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 22，頁 14951。

<sup>66</sup>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6，頁 317。

最首之李臣典冒暑受傷，一病不起，諸將弁亦傷痛山積，死亡相屬。臣弟國荃前痛業已痊癒，近因隨眾露處過久，又復遍發濕毒。臣帶兵多年，克城數十，罕見如次之勞苦者。」<sup>67</sup>「濕毒」並不一定是傳染病，只是從短時期內「遍發」來看，頗像某種急性傳染病的爆發或者流行。在南京的太平軍也遇到同樣的困擾，使他們處於戰守不能的境地。在李秀成自述中，他提到疫病流行對戰爭的影響：「天連逢大雨不息，官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各館病倒，見勢為難，攻又不下，戰又不成，思無法處，清軍又不出戰，總以嚴守為強，後路救兵又至，我軍病者又多，無兵可用。」<sup>68</sup>因連日大雨、疲勞和饑餓，引起大量疾病減員，並不一定是傳染病所致。只是從「一夜至天明，各館病倒」中，似乎表明軍隊中發生了某種急性傳染病，否則不會於一夜之間全部病倒。當同治三年(1864)南京被攻陷後，湘軍因病死亡人數大於死於戰陣者，有記載稱：「金陵一軍，圍攻二載，前後死於疾疫者萬餘人，死於戰陣者八九千人，今始克之。」<sup>69</sup>南京的戰鬥最為激烈，死於疾病者尚且多於死於戰陣者，其他地區可想而知。

由於史料缺乏，筆者無法「復原」傳染病在每一場戰役中所起的作用。但從以上的論述中，至少在咸豐八年贛、閩交界戰場，同治元年皖南、南京和蘇南戰場，同治二年蘇南、浙西和南京戰場，以及同治三年南京戰場中，傳染病在太平軍、清軍、左宗棠軍、淮軍和常勝軍中普遍流行，這不僅使軍隊大量減員，影響了戰爭進程，亦延長了戰爭的時間。

### 三、傳染病對戰區民眾的影響

軍隊中傳染病盛行，使作戰軍隊因疾病減員的人數大增。湘軍、淮軍可以

<sup>67</sup> 李圭，《金陵兵事匯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第29輯，卷4，頁284。

<sup>68</sup> 廣西通志館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61），頁85-86。

<sup>69</sup> 杜文瀾，〈平定粵寇紀略〉，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冊1，卷18，頁289。

不斷地從湖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勇；太平軍則採取擄丁策略，擄掠戰區民眾充當士兵或者軍隊後勤人員。比如在南京，張繼庚記載：「惟念江南未破城時，查戶口清冊，有二百六十餘萬之眾，破城後死難者十之三，被賊殺者十之一，迫而為兵四出者十之五，逃散者十之一。此時所存三萬餘人。」<sup>70</sup>

戰爭也使戰區民眾喪失最低的生活條件，以致身體抵抗力減弱，病原體侵襲機會增多，加之軍隊攜帶病菌，造成傳染病的廣泛流行，民眾的死亡率超過平時數倍。太平天國時期傳染病流行對戰區人口變動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引起曹樹基的關注，他根據民國二十五年《甯國縣誌》：「民死於鋒鏑者十之三，死於瘟疫者十之七」的記載，認為戰爭中全部人口損失的 70% 其實是死於瘟疫。<sup>71</sup> 在以後的著作中，他援引徽州的資料，再次強調同一觀點。<sup>72</sup>

正如曹樹基的研究所揭示的，皖南是瞭解傳染病對戰區人口影響相當典型的例子。皖南人口發生異常的下降始於咸豐十年；在此之前，雖遭兵燹，人口並未受到損失。至於原因，徽州人黃崇惺做了如下的解釋：

咸豐五年郡城之失，賊入城，即嚴啟閉，禁其黨四出擄掠。鄉人見賊目騎馬登古關嶺上，徘徊良久即退，蓋恐有伏兵也。譚渡距城最近，然皆未至。未幾，遂棄城退去。鄉人皆謂賊不甚擾民。六年九月北里亭之戰，村人皆隔岸觀戰，婦女亦有聚觀者。賊騎渡溪乃奔，然未幾亦即退。故十年賊陷之後，居人因狃於前事，皆不肯遠避，謂賊皆必不久駐。賊入山焚掠，猶以為官軍所為。以至巨家大族，無能免者。<sup>73</sup>

咸豐十年之後，太平軍開始騷擾徽州住民，「觀於咸豐十年郡城失守之後，深山窮谷，無往不能至。」<sup>74</sup> 這使得居民流離失所，遭受饑餓及流離之苦，大部份死於疾疫。從黃崇惺的解釋中可以深刻地理解這一點：

<sup>70</sup> 張繼庚，《張繼庚遺稿》，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冊 4，頁 778。

<sup>71</sup>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 年）〉，《歷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17-32。

<sup>72</sup>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 461。

<sup>73</sup> 黃崇惺，〈鳳山筆記〉，《近代史資料》，1963 年第 1 期，頁 140。

<sup>74</sup> 黃崇惺，〈鳳山筆記〉，《近代史資料》，1963 年第 1 期，頁 139。

庚申（咸豐十年）之亂，徽人之見賊遇害者，才十之二三耳。而辛酉（咸豐十一年）五月賊退之後，以疾疫亡之六七。蓋去其家已十閱月，草間露處，雖大雨雪無所蔽。魂魄驚怖，無所得食，日夜奔走而不得息。當是時家室流亡之苦，與夫屋廬殘毀之痛，猶未暇計及也。比賊退，各還其家，驚悸之魄既定，顧視家中百物，乃無一存，而日食之計，一無所出，或骨肉見掠於賊，渺然不得其音信。愁苦之氣鬱於其中，而兵燹之情動於其外，於是恹然病矣。又賊未退以前，鄉村糧食已盡，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賊退，米價每鬥到二千錢……於是饑餓而斃者亦不可勝計。<sup>75</sup>

從黃氏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戰爭中人口死亡的數量與戰爭持續的時間成正比。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民眾由於抵抗力降低遭受傳染病的機率就越大。至同治元年，饑餓不堪的徽州民眾，又遭受嚴重的霍亂侵襲，其流程度僅次於甯國和南京。<sup>76</sup>饑餓與流離所導致的疾病，加之同治元年的傳染病劇烈流行，使徽州人口大量死亡。民國《歙縣誌》記載：「國藩於上年（咸豐十年）六月駐師祁門，敵軍亦悉銳來攻，徽州蹂躪不堪，村舍焚燒殆盡，至是戰禍稍紓，斯時徽民不死於兵刃，即死於饑與疫，孑遺亦無幾。」<sup>77</sup>

皖南其他州縣的情況與徽州相同。廣德州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人口損失率為 94.5%，該地區的原住民在這場戰爭幾乎死亡殆盡。<sup>78</sup>咸豐十年二月初三日，「廣德失守警報至，在城附郭居民大半逃避鄉間。」<sup>79</sup>同治元年境內又發生傳染病流行，下文研究表明，此為古典型霍亂侵入，人口因此大量死亡。光緒《廣德州志》記載：「同治元年大疫，先是州民在賊中困苦流離，死者過半，

<sup>75</sup> 黃崇惺，〈鳳山筆記〉《近代史資料》，1963年第1期，頁140。

<sup>7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冊24，頁558。

<sup>77</sup> 吳克俊等纂，《歙縣誌》（民國十二年刊本），卷3，〈武備志·兵事〉。

<sup>78</sup> 葛慶華，《近代蘇浙皖交界地區人口遷移研究(1853-191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38。

<sup>79</sup> 胡長齡，《儉德齋隨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283。

至是又病疫，五月至八月，積屍滿野，傷亡殆盡。」<sup>80</sup>光緒《廣德州志》有更詳細的記載：「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種，糧絕山中藜藿薇都盡，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時屍骸枕藉，道路荆榛，幾數十里無人煙，州民舊有三十餘萬，賊去時遺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奇災。」<sup>81</sup>可見，由於戰爭，民眾避居他處，由於饑餓導致抵抗力降低，加上有劇烈的傳染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

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戰區環境相當差，疫病繼續流行，人口因而繼續死亡。甯國的例子最為典型。湘軍將領甘晉在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中，詳細描述了同治元年該城克復後的疫病大流行：

惟我軍自克甯郡後，暑疫大作，疫疾歿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隊者不及四成。甯郡初克，遺民降將不下二萬人，商賈及居民入城者數千人，兩月以來，兵民疫死者二三萬人。行路者面帶病容，十居八九，城內外五六里臭腐不可堪忍。沿路尚有屍骸，有旋埋而掩埋之人旋斃者。城河三里許，漂屍蛆生，或附船唇而上，城中之井及近城河水臭濁不可食，食之者輒病。食物惟米稍賤，餘皆四倍於皖省，兩倍於蕪湖。居民至數里外汲水而食，舟行者載水而食。晉在三十里外市罌盞載清水十餘石供船中之用，涓滴皆珍之。舟泊北門外三里新村，入城則鼻煙滿鼻，口銜生薑，親兵及肩輿者皆掩鼻而行，此行本欲飽看敬亭山色，桃華潭水，而氣味殊劣，鮮此清興。<sup>82</sup>

不僅如此，戰後疫情甚至數季未息。曾國藩在一份奏摺中稱：「東流營次，徽城克復已近三月，而居民寥寥，疾疫流行，道殣相望，即徽籍之轉徙他處者，亦復或病或故，凶問不絕，豈兵後子黎劫數尚未滿耶！」<sup>83</sup>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瘟疫是如此嚴重，以致於同治三年南陵人劉鎮鐫主張，「皖南人民

<sup>80</sup> 胡有誠等修，丁寶書等纂，《廣德州志》（光緒七年刊本），卷 58，〈祥異〉。

<sup>81</sup> 胡有誠等修，丁寶書等纂，《廣德州志》（光緒七年刊本），卷 60，〈兵寇〉。

<sup>82</sup>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6，頁 220。

<sup>83</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五·書劄》，卷 16，頁 14449-14450。

死亡，屍骸狼藉，村內、村外、池中、井中在在皆是，春氣動作，必然蒸成瘟疫，今宜飭各甲長設法掩埋，使境內人民得安居，不召災殃。」<sup>84</sup>

在皖南其他人口損失嚴重的地區，情況同樣如此。湖北黃梅縣人鄧文濱在《醒睡錄初集》中記載：「咸豐未造及同治初，服江左若六安、英（山）、霍（山），江右若彭澤、太（平）、池（州）等府、州、縣。逆氛煽後，人煙稀少，田地荒蕪，守土官征賦無從，招徠外省人民居住耕種，或計畝均分，或收租納稅，置買田宅……往往華堂廣廈，白日出鬼，擊人立斃……又連年戰鬥，屍骸腐朽，蒸鬱積為瘟氣。毒經觸發，腫頭爛足，而死者十有八九。」<sup>85</sup>他還講述了一個十分生動的例子：

予佃人停前鎮姜朱二姓，家小康，棄近業而圖遠利，邀數十人至彭澤、東流界，佃田贅婦，書籍器皿充積，平時約值數千金，其中以四十金易之。閱二載，僅一二人回，毛竦骨立，鵠面鳩形，至親兒莫識，蓋瘟餘也；餘皆道斃，人琴俱亡矣。又下江一帶，曾侯奏請招徠，設勸農局，給牛力、農具、籽種，從者如市，疫死者不知凡幾，已往人視為畏途，閱數年而始平。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其流毒有如此夫！<sup>86</sup>

戰後皖南有廣闊的荒蕪土地，為「圖遠利」的人進入這一地區，卻遇到了持續的疫病流行，成為外來移民進入這一地區的最大障礙，也使外來移民對這一地區「視為畏途」。

太平天國時期，皖南地區人口共死亡 1,002.5 萬人，損失率為 81.5%。江寧、揚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六府和太倉直隸州，在太平天國戰爭中人口共死亡 1,679 萬人，損失率為 48.4%。浙江大約損失人口 1,630 萬人，損失率為 52%。<sup>87</sup>比較而言，同屬戰區的蘇南與浙江存活的人口較皖南更多，其原因在於，「避難於水鄉者十存六七，避難於山鄉者百無一二。蓋水行可以多帶衣米，

<sup>84</sup> 劉鎮鏞，〈皖南肅清上曾滌生相國議善後條陳〉，收入余誼密修，徐乃昌等纂，《南陵縣誌》（民國十三年刊本），卷 41，〈藝文〉。

<sup>85</sup> 葛慶華，《近代蘇浙皖交界地區人口遷移研究(1853-1911)》，頁 27。

<sup>86</sup> 鄧文濱，〈醒睡錄初集〉，《近代史資料》，1980 年第 2 期，卷 3，頁 222。

<sup>87</sup>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卷 5，頁 455-508。

而老弱疾病亦得附與俱行。陸則惟強壯者，力能攜米斗餘而奔走馳逐之時，則又枵腹而不暇舉竈。」<sup>88</sup>其根本的原因在於水鄉可以用船帶走更多的糧食，從而減輕長時間戰爭中的糧荒問題。從地形來看，皖南地區屬於丘陵山地，而江南地區屬於平原水鄉。那麼，傳染病對於這一地區的人口損失，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又是通過何種途徑發生作用呢？

太平軍首先攻佔的地點是城鎮，引起城鎮人口的遷移，此正如嘉興濮院鎮人沈梓所描述的，「時郡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長毛至一聲，皆紛然逃。」<sup>89</sup>1860年7月14日的《北華捷報》這樣評論道：「當一支叛軍已在距一個大城市七十或一百英里的地方出現的時候，這個預兆便足使這個大城市的居民逃避一空，紛紛下鄉，從而使城內知縣處於無能為力的地位。」<sup>90</sup>其他地區情況證明這一評論的正確。咸豐十年，嘉興「城中紳士早遠避，無一人在者，居民惟貧乏者在城，城任人出入，無人稽查」，吳興縣「城中已去一半」，<sup>91</sup>湖州「人民都在離家避亂」。<sup>92</sup>上海的記載最為詳細，據云：「侵襲清朝官員的恐怖，已經波及到上海及其附近各城市的清朝官員，住在這些城市中的居民，由於不相信這些官員有維持秩序的能力，已經成批地逃往鄉村地區。這種情形在距離上海30英里的松江府尤為顯著。……松江府城內的商店大都閉市，連外國人在該城出現，也不能吸引一批群眾。當時天正落雨，我們看到坐在船上的老年人，他們在露天的地方為雨所淋濕，表現出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令人極其難受。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係向金山及乍浦與吳淞之間其他若干小城鎮逃去。」<sup>93</sup>

城鎮居民在流亡過程中的處境相當悲慘。南京人李圭在逃亡過程中，沿途「烈日暴雨，夜多露宿，饑不得食，痧脹則人人不免，無日無之」；所住地方，「蚊殷殷然，若雷鳴，揮之不去」；「又咸以飲水不潔，受濕毒之氣，生瘡疥，

<sup>88</sup> 胡長齡，《儉德齋隨筆》，頁288。

<sup>89</sup> 沈梓，《避寇日記》，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4，頁22。

<sup>90</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112。

<sup>91</sup> 陳乃幹，《陽湖趙惠甫年譜》，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冊8，頁732。

<sup>92</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164。

<sup>93</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88。

備嘗辛苦，骨立形銷。」<sup>94</sup>嘉善人趙洪揚「自善城失守之後，避跡鄉村」，他為自己在鄉下找到住處，十分滿足：「現在而論，逃難露宿者有人，此屋較之已如天堂矣。」<sup>95</sup>常熟人湯氏在逃亡過程中，備嘗艱辛，據他觀察：「男人逃遁，婦女啼哭，黑夜奔波，露匿田野，沾水塗泥，疲睡稻叢，勞瘁危險，備嘗艱苦。」他自己也有親身體驗：「中秋夜涼，蚊蚋尚多，衣薄腹饑，悲號四起，淒其無極。」<sup>96</sup>在這種背景下，難民極易感染瘧疾和痢疾。吳江人吳非在咸豐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因暫避一庵中，庵內逃難之人甚多。……一夜佛燈明滅，蚊蟲滿身」，至六月十六日，「余在龍田茅廬病瘧，下痢，臥床不起，十七日至二十日，病稍輕。」<sup>97</sup>咸豐十年八月廿九日，趙洪揚「又聞餘親患瘧疾」。<sup>98</sup>吳縣人吳大澂在逃難中也感染間日瘧，「熱形似瘧，間日一來」。他的母舅「亦染瘧疾臥床」。<sup>99</sup>嘉興人沈梓在逃難過程中，「七月初四日，……是夜寓學善堂鄭妹丈處，即發瘧。……初六、七、八、九、十連發瘧，精神憊甚，於是不果往。」<sup>100</sup>從持續發瘧來看，沈梓所患為惡性瘧疾。

在江南地區，良性的間日和三日瘧為最主要的瘧疾類型，但並不意味著戰爭中的瘧疾危害性小。一般來說，按蚊更喜歡吸食牛血，戰爭中絕大多數耕牛被充作食物，人成為被攻擊的對象。<sup>101</sup>據南京軍區衛生部工作組 1949 年 10 月，對松江地區居民住房和牛棚中之中華按蚊密度調查，每人工小時（即一人在一小時內捕獲的按蚊數量）分別為 37 隻與 131 隻。<sup>102</sup>對於逃難的人來說，這意味著人口由低瘧區進入高瘧區，因而瘧疾發病率，會有大幅度提高。從人

<sup>94</sup> 李圭，〈思痛記〉，《金陵兵事匯略》，頁 93、94、51。

<sup>95</sup> 趙洪揚，〈嘉善庚申紀事〉，收入王慶成，《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頁 438。

<sup>96</sup> 湯氏，〈歟聞日記〉，《近代史資料》，1963 年第 1 期，頁 80、84。

<sup>97</sup> 知非，〈吳江庚辛紀事〉，《近代史資料》，1954 年第 1 期，頁 26、33、35。

<sup>98</sup> 趙洪揚，〈嘉善庚申紀事〉，收入王慶成，《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頁 438。

<sup>99</sup> 吳大澂，〈吳清卿太史日記〉，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冊 5，頁 344。

<sup>100</sup> 沈梓，〈避寇日記〉，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4，頁 26。

<sup>101</sup> 歐洲的經驗，參見皮特·布魯克史密斯(Peter Brooksmith)著，馬水波譯，《未來的災難：瘟疫復活與人類的生存之戰》（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頁 189。

<sup>102</sup> 石文志、伏崑，《解放戰爭時期華東部隊衛生工作簡史》，頁 179。



群易感性考慮，機體缺乏免疫力，易受感染，更為重要的是，瘧疾臨床症狀多重。<sup>103</sup>戰爭期間環境的惡化，更使得瘧疾危害性大大增強。

戰爭中城鎮人口有的遷往上海，有的避難蘇北，更多的則是移居鄉村。咸豐十年五月，「蘇（州）城告急，士商挈眷避鄉，僦居在蕩口一帶為多，雖窮村僻巷，家亦填戶滿。」<sup>104</sup>對於城市居民來說，鄉村環境使他們頗感不適。咸豐十年五月廿三日，吳縣人蔘村遁客在新郭寄宿一夜後，寫下這樣的感受：「長夏暑氣逼人，村居湫隘，地形卑濕，時遇陣雨，則床頭閣閣蛙鳴，復兼病兒呻吟在床，此情此景，當何以堪？」<sup>105</sup>居鄉不慣使城市居民多返回原居地，有記載稱，「凡城人避居鄉村，茅屋低隘，嬌養成生，不慣習苦，每染暑疾熱瘡，由此大半回城矣」，「只有一二小心者膽怯未回。避居鄉間者屬少數。」<sup>106</sup>但在實際上，太平軍在策略上是維持一定規模的城市人口，對於已經逃亡的人口，一般不會讓其再返回原地。城市居民不服鄉村水土，往往引發疾病，死亡率大大增加，如無錫人范誠生母「居鄉常病」。<sup>107</sup>在南潯，「潯民之避於鄉者患病，不慣久住，遷回不少」；戰爭結束後，「人民被擄被戕尚少，而避鄉者之病死、憂死者不可勝數。」<sup>108</sup>

傳染病在受收容的難民中也廣泛流行。在無錫，「旋錫、金派養難民三千餘人，分四門寺廟居之，時值亢旱酷熱，臭穢不堪，疾病叢生，急為之醫治，疫氣傳染，死者頗眾。吾邑避鄉之家，不過十之二三，蓋緣天時酷暑故也。」<sup>109</sup>同治元年六月，嘉興紳士「往湖城領難民出城，撥載至厚林、雙林、盛川四處，就居民間逃亡空屋中，日施糜粥醫藥，每局人以二三千計，可謂大善舉，全活者無算，然皆饑餓日久，感受暑濕寒氣，物故者亦居其半。」感受暑濕寒氣者，

<sup>103</sup> 黃玉蘭，《實用臨床傳染病學》（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0），頁 392。

<sup>104</sup> 佚名，〈平賊紀略〉，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1，頁 235。

<sup>105</sup> 蔘村遁客，〈虎窟紀略〉，收入中華文史論叢編輯部編，《太平天國史料專輯》，頁 24。

<sup>106</sup> 湯氏，〈鯀聞日記〉，《近代史資料》，1963 年第 1 期，頁 79。

<sup>107</sup> 張乃修，〈如夢錄〉，《近代史資料》，1955 年第 3 期，頁 78。

<sup>108</sup> 溫鼎，〈庚申粵匪踞鎮紀略〉，收入朱從亮，《南潯文獻新志紀餘》（內部印行本），頁 18-19。

<sup>109</sup> 佚名，〈平賊紀略〉，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1，頁 235。

會有一部份傳染病患者。比如中醫所說之濕溫，與現代醫學所稱之傷寒，症狀及體徵基本相同，也符合傷寒多係散發的特徵。<sup>110</sup>沈梓至利濟寺，觀察到這樣的景象：「見寺中難民獨多，天甚炎熱，四處散居，人皆坐臥地上，各相枕藉。又均病瀉痢，穢氣逼人，死者日二十餘人。」<sup>111</sup>戰後受收容的難民也大量感染疾病：「復城後，各鄉鎮立局，收養流離失所之民……冬春之饑寒交迫，夏秋之暑濕薰蒸，病死無數，非獨殮無棺木，葬亦無千人坑埋之。」<sup>112</sup>受收容的難民尚且如此，那些未被收容的避難民眾，「沿途露宿、餓死、疫死及凍死無算。」<sup>113</sup>

咸豐十年，太平軍佔領江南府州縣治所後，又向鄉村與市鎮「打先鋒」，引發鄉村人口的流動。在昆山，「十一年辛酉，四鄉鎮中各建賊館，百端需索，至於敲骨吸髓。同治元年四月，賊又四出鄉鎮打先鋒，窮村僻野，無不搜劫淨盡。其焚掠最甚者，西水鄉如正儀、巴城一帶，東南鄉如陳墓、蓬閩、菴葭浜、安亭諸鎮。」<sup>114</sup>在常熟，「當在七夕三四日，既失楊舍，西鄉之民望東移居，每日不絕。但見貧民肩擔背負，攜老攜幼，力疲足繭，休憩道旁，人心日夜惶駭，到中元節後才定。」<sup>115</sup>同治元年閏八月廿二日，史致諤向曾國藩彙報了太平軍在奉化的「打館」情況，他說：「直連奉（化）邑之南渡方橋，蔓延四十餘里。」<sup>116</sup>戰區民眾對太平軍相當恐懼，以致謠言四起，民眾爭相躲避。在常熟，「每日謠言不一，每早起五更造飯，先行吃飽，便各狂奔，望東走避，或將婦女置頓水區，男子照顧房屋。長毛一到，百計避匿，或貧家衣食不周，親族希少，藏身河灘草澤間，失足溺死甚夥……各鄉村民，日夜不敢居家，夜以繼日則四遠探聽，賊蹤尚遠，而民互相謠言，寢食無暇，片刻不能安靜。」<sup>117</sup>

<sup>110</sup> 蘇北人民醫院中醫內科編，《任繼然臨床經驗錄》（揚州：揚州人民出版社，1960），頁 31-32。

<sup>111</sup> 沈梓，〈避寇日記〉，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4，頁 169。

<sup>112</sup> 佚名，〈平賊紀略〉，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1，頁 305。

<sup>113</sup> 佚名，〈平賊紀略〉，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1，頁 295。

<sup>114</sup> 《昆新兩縣重修合志》，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太平天國資料》（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 138。

<sup>115</sup> 湯氏，〈歛聞日記〉，《近代史資料》，1963 年第 1 期，頁 78。

<sup>116</sup> 〈史致諤檔案〉，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太平天國資料》，頁 184。

<sup>117</sup> 湯氏，〈歛聞日記〉，《近代史資料》，1963 年第 1 期，頁 89。

鄉村民眾逃亡現象如此嚴重，以致於 1860 年 5 月 23 日，太平軍張貼了這樣一份佈告，其內容是：「且已嚴禁官兵，不准下鄉滋擾。胡爾百姓，不患如子趨父，而反避他方，今彼在轉徙無定，令我寢饋難安。」<sup>118</sup>

在江浙戰場的初期，不少鄉村居民並未逃難，而是在村落附近躲避軍隊。據觀察，「叛軍武部部隊沿途所經之處，土地荒蕪，耕者絕跡，因為他們有的被擄，有的被殺，有的逃亡。但是在離開大路半英里的地方，人們安然自得地在田野裡耕作。小麥和大麥都長得茂盛，人們正在準備灌溉稻田。」<sup>119</sup>戰爭倖存的鄉村人口在其村落周圍躲避軍隊，1862 年 9 月 6 日的《北華捷報》稱：「離開這地方後，我們到達老閘橋防衛據點，那裡也有大批人群聚集在道路上，好像舉行集市一樣。附近的房屋與棉花田裡，到處都是聚在一起的六人、八人乃至十人的群眾，他們預備在這些地方過夜，有的人在其祖先墓碑旁邊休息，雖處在墳地中，只要能夠遠離可怕的太平軍，他們顯然很為欣慰。」<sup>120</sup>

未逃難他方的鄉村民眾，雖然可以避免因流亡引發的致命疾病，但他們不得不面對嚴重的饑荒。戰爭使大量土地荒蕪，有時也會使農民無法收割莊稼。同治元年，左宗棠上奏說：「此次（同治元年）之變，膏腴之鄉盡為賊踞，而上年（咸豐十一年）逆首李世賢、李秀成先後竄浙，正值農民分秧割稻之時，舊穀被掠，新穀無收，不但軍食無從採辦，即遺黎僅存者率皆饑疲不堪，面無人色，甚則槁死破屋之中，齧脛縱橫，無人收殮，疫氣流行，田土荒廢，皆由於此。」<sup>121</sup>於此同時，作戰雙方都在搶奪農民的糧食，有時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北華捷報》的記載稱，同治元年，「在南京周圍不到一百英里範圍內，搶劫與屠殺竟達到這樣的規模，致使這帶地方成為荒野一片……他們有時已使這個地區陷於災荒最為嚴重的階段，於是有些遭受困苦最甚的人，已不得不墮入食人的地步。」<sup>122</sup>太平軍軍隊中則有充足的糧食，「我們進入的每一幢房子，

<sup>118</sup> 〈紹天豫周海醒四民〉，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冊 2，頁 726。

<sup>119</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 182。

<sup>120</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 357。

<sup>121</sup>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 2，頁 128。

<sup>122</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 435。

幾乎都有死人或者快要死去的人。從不幸的鄉民那裡搶來的米糧儲量很大，還有許許多多耕牛與馬匹。」<sup>123</sup>這種情況導致鄉村發生嚴重的饑荒，據《北華捷報》的記載，鄉村缺乏糧食，使「常勝軍」從「南翔周圍的鄉村無法獲得軍糧的供應，因為那裡基本上已無糧食可取」，故而「每一件東西都要從上海隨軍帶來」。<sup>124</sup>在同治二年的一份奏摺中，左宗棠描述了江南地區饑荒慘景：

蘇郡各屬被賊蹂躪，深淺不等，至太倉之嘉定、松江之青浦、金山、華亭、婁縣，收復雖已年餘，人煙尚甚稀少。常州、江陰、無錫、金匱各縣，城鄉村市一片焦土，遍地黃蒿，行終日而不見人，偶遇二三難民，露處僵餓，旦夕待死。現已督飭官紳分投振撫。聞常、鎮各屬被踞地方人自相食，賊亦缺糧，其形大率類是。<sup>125</sup>

戰爭使正常的農業生產無法進行，由於出現嚴重的糧荒，饑荒使得民眾機體免疫功能下降，各種疾病發病率和死亡率大大提高。左宗棠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說：「浙省膏腴之壤，盡為賊據。衢、嚴一帶，山鄉瘠薄，素鮮蓋藏，頻年屢遭兵燹，小民死喪流亡，田荒屋毀。臣軍行所至，目睹災民男婦露宿野處，道殣相望，有數日不得一食者，有一家餓斃數口者。」這種情況容易使疫病發生大規模流行，危害性也大大加劇。「近復疫氣流行，十人九病，而浙之殘黎幾於靡有孑遺矣。」<sup>126</sup>

從皖南和江南的例子可以看出，當一支稍有規模的軍隊進入一個地區時，這裡的人口一般都會躲避到周圍地區，甚至遷移到更遠的地區，人與病原體的接觸機會增加；與此同時，病原體的習性發生改變或者活動力加強。戰爭促使發生糧荒，人口機體免疫機能下降，由此造成大量人口染病死亡。當他們返回家鄉時，所遇到的是因為軍隊長時間佔據所造成的嚴重饑荒，以及環境的惡化，這也易使他們感染各種疾病。因而，傳染病無疑使戰爭的規模擴大，它嚴

<sup>123</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 325、333。

<sup>124</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 342。

<sup>125</sup> 錢勳，《吳中平寇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第 81 輯，卷 6，頁 208。

<sup>126</sup>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 1，頁 114。

重干擾了原先的環境、病原體和人之間的平衡關係，這種干擾的巨大代價，就是大量的人口死亡。

儘管這種干擾使戰區常見的傳染病危害加劇，但瘧疾、痢疾、傷寒、回歸熱等病傳染性並不是特別強，病死率也不高。當戰爭干擾鼠疫自然疫源地，以及當同治年間古典型霍亂傳入戰區時，機體免疫功能已經大大下降的民眾，所面對的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 四、鼠疫、霍亂與戰區人口

咸豐八年，石達開率軍從衢州和處州突入閩北，石達開的軍隊在這兩個地區滯留時間很短，也並未與清軍和當地民團展開激烈的戰鬥，但這次軍事活動卻引發一場傳染性猛烈的傳染病。

早在清代「三藩之亂」時，受戰爭影響較重的金華府、衢州府和處州府等地，已經發生過瘟疫流行，從而導致當地大量人口死亡和外來移民的遷入。<sup>127</sup> 盧燦在〈禳疫文〉中記載：「遍召名醫，弗遏……忽生疫疾，比戶相傳，或朝耕而夕病，或晨興而晝眠。只見木據寂寂，流水湍湍，明月娟娟，野草芊芊，聞之者莫不拊膺而太息，見之者莫不涕淚而漣漣……胡爲屢投而不效。」在〈逐妖牒〉中，他記載道：「大兵之後，繼以大疫，南源一帶，比戶罹災，告於神而疫氣潛消。」<sup>128</sup> 在當時條件下，瘧疾、痢疾、傷寒和天花等當地常見急性傳染病，並不能「遍召名醫，弗遏」，很可能清初的戰爭引發了某種病死率極高的傳染病。

咸豐八年的戰爭再次引發了疫病的流行。光緒《處州府志》記載：「咸豐八年九月，麗水大疫，然四、五兩月，白晝群鼠銜尾疾走，大路旁亦見之。」<sup>129</sup> 雖然瘟疫流行之前或者流行期間，出現死鼠或者鼠類成群遷移現象，並不意味

<sup>127</sup>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卷5，頁49-51。

<sup>128</sup> 余紹宋修纂，《龍遊縣志》（民國十四年鉛印本），卷35，〈文徵三〉。

<sup>129</sup> 潘紹詒修，周榮椿纂，《處州府志》（光緒三年刊本），卷25，〈祥異〉。

著一定有鼠間鼠疫發生，但鼠類異常活動對於判別某種疫病是否為鼠疫，是值得注意的考量因素。<sup>130</sup>在浙江衢州，當地醫生雷豐作《時病論》，其中有〈溫瘟不同論〉一篇，議及咸豐、同治年間該地發生的大瘟疫，他說：「咸豐八載至同治元年，粵匪竄擾吾衢，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沿門合境，盡患瘟疫。」<sup>131</sup>由於缺乏史料記載，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們從他治療此種瘟疫的方法上判斷，此疫可能為鼠疫。<sup>132</sup>石達開的軍隊還在閩北一帶活動，這次活動同樣引發了某種劇烈流行的傳染病。據 1940 年代《閩北日報》記載：「閩北近百年中，本地人口不但未見增加，而且減少一半，皆因瘟疫之故。」瘟疫流行引起了外來移民的陸續遷入，當地人的觀察是：「當時建甌人口雖有二十餘萬，但大都是由贛東及其他外地遷來的，不能算做本地人口。」<sup>133</sup>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閩北建甌、邵武和延平三府人口損失率分別為 50.3%、65.6%和 39.4%。<sup>134</sup>上引進入閩北的劉印渠部隊，也在咸豐八年感染一種當時無法治療的傳染病，個案死亡率近 50%。從無法治療、傳染性強、死亡人口多以及高死亡率來看，咸豐八年這些地方的疫病，很可能為某種烈性傳染病（鼠疫或者霍亂）。

由於資料的缺乏，目前還不能確定這些地方的傳染病究竟是不是腺鼠疫。石達開的軍隊在衢州、處州和閩北活動的時間並不長，因而對於該地的干擾不大，疫病也沒有傳染到其他地區，因而只對局部地區的人口變動產生影響。對於太平天國戰區影響最大的疾病因素，是同治初年的古典型霍亂。

1817 年，古典型霍亂傳入中國以後，遂成為影響甚大的烈性傳染病之一。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發生了幾次古典型霍亂流行，其中尤以同治元年和同治二年

<sup>130</sup> 對於鼠疫的辨別，參見李玉尚，〈近代民眾和醫生對於鼠疫的觀察與命名〉，《中華醫史雜誌》，2002 年第 3 期，頁 173-178。

<sup>131</sup> 雷豐，〈時病論·附論〉，收入于伯海主編，《傷寒金匱溫病名著集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頁 1076。

<sup>132</sup> 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收入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 147-148。

<sup>133</sup> 潘芳，〈戰時建甌另一災禍——鼠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建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建甌文史資料》（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7），第 11 輯，頁 74-75。

<sup>134</sup>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卷 5，頁 507-508。

的流行最為嚴重。如上所述，古典型霍亂的侵入，不僅對於戰區的人口產生了毀滅性的打擊，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戰爭的進程。進一步要討論的問題是，儘管現有的研究已經證明同治元年和同治二年戰區所流行的傳染病中，古典型霍亂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都未進行古典型霍亂症狀辨別，對於古典型霍亂流行區域以及對戰區人口的影響，也未加以深入的討論。尤其當中醫將一般性的腸道傳染病也稱為「霍亂」時，對於史料進行正確的解讀就顯得尤為必要。

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世界範圍內發生了兩次古典型霍亂大流行。一般認為，受第三次古典型霍亂大流行影響，中國在 1854 年發生古典型霍亂，於 1857-1858 年達到流行高峰。1863 年，第四次古典型霍亂大流行開始襲擊中國。<sup>135</sup>據溫州人趙鈞的觀察，「余生七十年內，見過大疫三次，庚辰(1820)、甲午(1834)、甲寅(1854)。」<sup>136</sup>咸豐四年(1854)，常熟「秋有時疫極重」。<sup>137</sup>第二年，又有疫病流行，「知今秋(1862)無家不病，素衣盈途，與咸豐五年相仿。」<sup>138</sup>同治《上海縣誌》也記載咸豐五年，「秋大疫」。<sup>139</sup>由於這些地方疫病發生或者流行的時間，適值世界第三次霍亂大流行，且霍亂是一種輸入性傳染病，儘管沒有詳盡的症狀資料可資證明，但推測為霍亂的可能性很大。在此之後的咸豐六年至咸豐七年，霍亂呈散發狀態，如在傳教士所開的寧波醫院中，這段時間內共診治 7,774 人，主要疾病為瘧疾、風濕、肺炎、支氣管炎、消化不良，另有腹瀉 254 人，霍亂 1 人。<sup>140</sup>在杭州，咸豐六年，杭州人患「吊腳痧，吐瀉腹痛，足筋拘急，不即救，一二時即死。」<sup>141</sup>古典型霍亂患者不會有「腹痛」症狀，因而患者主要是常見的腸胃病。咸豐八年，古典型霍亂再次出現，年復

<sup>135</sup> R. Pollitzer, *Choler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59), p. 31.

<sup>136</sup> 趙鈞，〈過來語〉，《近代史資料》，號 41(1980)，頁 200。

<sup>137</sup> 柯悟遲，《漏網嗎魚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2。

<sup>138</sup> 龔又村，〈自怡日記〉，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4，頁 466。

<sup>139</sup> 應寶時修，俞樾纂，《上海縣誌》（同治十一年刊本），卷 30，〈祥異〉。

<sup>140</sup> Macgowan,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Ningpo for 1856 and 1857,"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for the Years 1858 and 1859* (Macao, 1860), pp. 16-17.

<sup>141</sup> 陸以湑，〈冷廬醫話〉，收入曹炳章編，《中國醫書大成》（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冊 9，卷 3。

一年，時有發生，直到 1867 年方止。<sup>142</sup>咸豐十年，江南地區發生較大範圍的傳染病流行。六月初，金壇「疫痢大行，兵民死亡者日一二百數。設藥局五而治實不及。」<sup>143</sup>七月十七日，「烏鎮方大疫，每十家中必有死者。」<sup>144</sup>十月十六日，嘉興新塍「自此月初六雨後，天淅淅雨，陰慘之氣逼人，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病者都是寒疾之狀，多則二日，少則一周時許，亦有半日即死者，直至廿三、四雨止，疫稍稀。」<sup>145</sup>當地死亡速度如此迅速的疫病只有少數幾種，加之又是「寒疾」，可斷為古典型霍亂。咸豐十一年，濮院「盛行霍亂轉筋之證」。<sup>146</sup>江南地方誌對咸豐年間的這兩次疫情記載甚少，說明傳染病並未呈現出大規模流行之勢，因而除了某些疫點之外，對整個地區影響並不大。

同治元年，發生了全國性疫病大流行。在上海，「霍亂在上海廣泛盛行，並且成爲外僑和華人大量死亡的原因。也就是在這一年，在華的英國軍隊遭受了致命的打擊。」<sup>147</sup>這年著名醫生王士雄到達上海，據其觀察，上海「霍亂、臭毒、番痧諸症盛行……死者日以千計，道殣相望。」<sup>148</sup>《北華捷報》也有同樣的記載：「在前面，我們曾提到這年夏天襲擊我方海陸軍部隊的嚴重病患，它們在上海普通人中也同樣流行，但到冬天，疫癘猖獗的情形似已過去，軍隊與海員也比以前健康，使他們遭受影響的霍亂已潛伏下去。」<sup>149</sup>霍亂也傳染到上海周邊地區，伍連德引西人資料指出：「上海松江間相距一百二十里，其間之居民，死於此次之流行者，約佔全數八分之一，外僑與船員亦多受染。英軍

<sup>142</sup> D. B. Simmons, "Cholera Epidemics in Japan," *China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No.18 (1879), pp. 2-3.

<sup>143</sup> 佚名，〈金壇圍城追記〉，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太平天國史研究室編，《江浙豫皖太平天國史料選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頁 82。

<sup>144</sup> 沈梓，〈避寇日記〉，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4，頁 27。

<sup>145</sup> 沈梓，〈避寇日記〉，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4，頁 46。

<sup>146</sup> 夏辛銘纂，《濮院志》（民國十六年刊本），卷 30，〈志餘〉，頁 1238。

<sup>147</sup> Health Officer's Report, "Annual Report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873," 上海檔案館藏 U1-16-4704, p. 9.

<sup>148</sup> 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收入曹炳章編，《中國醫書大成》，冊 4，頁 654。

<sup>149</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頁 453。



醫報載，華北英兵死於霍亂者，佔總數百分之五，可知此次流行之劇烈矣。」<sup>150</sup> 當地人對此亦有記載，在松江，「自七八月以來，城中時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僅一二得免，甚至有一家連喪三四口者。余家老稚十五口，幸獲平安，真天佑也。」<sup>151</sup> 痢疾並不是「時疫之外」的一種疾病，而是古典型霍亂流行時伴發的下瀉現象。古典型霍亂波及到蘇州府吳江縣，吳江人倦圃野老記載：「時疫流行，日死數十人，名吊腳痧，無方可治，不過周時。上海更甚，鄉間亦然。」<sup>152</sup> 「吊腳痧」為江南民眾對古典型霍亂最為通俗的叫法。在蘇州，駐守在這裡的太平軍注意到食用西瓜與這年軍中疫病流行有直接關係，故而禁食西瓜。事實上，由於霍亂可通過蒼蠅傳播，民間社會常以為食用西瓜與感染古典型霍亂有連帶關係。古典型霍亂又經太倉州傳至常熟，這一年常熟「時疫流行，名子午痧，朝發夕死。上海極重，漸延太境，吾方間亦有之。」光緒《常昭合志稿》記載：「子午痧，亦名癘螺痧。」<sup>153</sup> 「癘螺痧」即為霍亂。在嘉興，古典型霍亂的流行是相當普遍的，常熟人龔又村的記載稱：「夏秋以來，無家不病，病必數人，數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sup>154</sup> 是年五月份，嘉興新塍鎮「有吐瀉等病，不及一晝夜即死」，從死亡速度極快、發生時間和上吐下瀉等方面判斷，此疫應為古典型霍亂。杭州在同治元年被清軍佔領後，「遍地屍骸，河內井中皆滿，克復後雖已浚河淘井，究竟受傷過重，餘毒尚存。自前歲由閩遷浙旗丁五六百人，陸續死已太半，雖因水土不服所致，而實則屍氣為殃也。故有朝得病而夕亡者，亦有晨餐甫畢投箸而即歿者。」<sup>155</sup> 此疫從染病到死亡的時間非常短，推測為古典型霍亂。

同治元年，蘇南、浙北地區流行古典型霍亂，似無疑義。這一年皖南地區

<sup>150</sup> 伍連德，《霍亂概論》（上海：海港檢疫管理處，1937），頁10。

<sup>151</sup> 姚濟，〈虎窟紀略〉，收入中華文史論叢編輯部編，《太平天國史料專輯》，冊6，頁507-513。

<sup>152</sup> 倦圃野老，〈庚癸紀略〉，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太平天國資料》，頁106。

<sup>153</sup> 鄭鍾祥等修，鹿鴻文等纂，《常昭合志稿》（光緒三十年刊本），卷47，〈祥異〉。

<sup>154</sup> 龔又村，〈自怡日記〉，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4，頁453-466。

<sup>155</sup> 《申報》（上海），1874年6月15日。

和湖州府西部地區也經歷了一場非常大的瘟疫。宣城「咸豐季年賊據郡城，流離載道，……城既克，瘟疫流行。」<sup>156</sup>甯國的瘟疫最為嚴重，「同治元年亂定五月，甯國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藉，無人掩埋。」（見程子山，《劫後餘生錄》：據鄉老言：甯民死於鋒鏑者十之三，死於瘟疫者十之七，散於四方來歸者不及十分之一。至今土著客籍多足以徵之）。<sup>157</sup>又有資料稱：「同治壬戌以後，賊來，但見民殺賊而俘賊衣糧以上山。至此後，甯民之死皆死於疫，而非死於戰。」<sup>158</sup>在石埭，「同治元年閏八月，疾疫盛行，死亡相繼。」<sup>159</sup>毗鄰皖南的湖州府孝豐縣在同治元年也發生非常劇烈的傳染病流行，有記載稱：「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半。」<sup>160</sup>一份關於孝豐縣的資料這樣說：「自太平軍攻佔縣境，連年戰亂，田園荒蕪，民恃野穀、野菜為生。疫癘盛行，尤以元、二兩年為甚，死者什八九。」<sup>161</sup>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時期雲南回民戰爭的主要戰場，也流傳著與皖南相似的鄉老傳說。據 1950 年代的調查，雲南民衆言及回民戰爭中「刀、兵亂死一倍，害癘子病（鼠疫）死就兩倍」，或說「這個病，死人無數，兵刀死了十分之三，鼠疫死了十分之七」，或者說瘟疫死亡人數佔戰前當地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由於 1950 年代的調查，尚有染疫自然村的抽樣調查數和單個自然村的鼠疫死亡人數，在估算出戰前當地總人口數和戰爭中人口損失數之後，就可計算出鼠疫死亡人數，在戰前當地總人數和戰爭中損失人數中的比例，所得結果與百姓的口述一致，因而百姓的口述是可信的。<sup>162</sup>儘管兩地流行的疫病種類不同，但死亡人數上如此的相似，這不能不讓人揣測，在造成人口

<sup>156</sup> 李應泰等修，章綬等纂，《宣城縣誌》（光緒十四年刊本），卷 40，〈續補遺〉。

<sup>157</sup> 楊虎修，李丙霽纂，《甯國縣誌》（民國二十五年刊本，卷 14，〈災異〉）。

<sup>158</sup> 周贊，〈梅村千人墓記〉，收入楊虎修，李丙霽纂，《甯國縣誌》，卷 12，〈藝文志中〉。

<sup>159</sup> 陳惟壬等纂，《石埭備志彙編》（民國三十年刊本），卷 1，〈大事記稿〉。

<sup>160</sup> 劉濬修，潘宅仁纂，《孝豐縣誌》（光緒三年刊本），卷 8，〈祥異志〉。

<sup>161</sup> 王微，《孝豐志稿》，卷首，轉引自葛慶華，《近代蘇浙皖交界地區人口遷移研究(1853-1911)》，頁 27。

<sup>162</sup> 李玉尚、曹樹基，〈咸同年間的鼠疫流行與雲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19-32。

銳減的重大戰爭中，一般規律就是疫病死亡人數佔全部人口損失的 70%，和戰前當地總人口的 40%。

不僅以上這些地區疫情嚴重，同治元年秋後，處州府「又大疫傳染，死者無數，村落流離破碎，半成丘墟。處郡之被寇也，不止一次。本年（指同治元年）夏間，發逆自溫竄其境，受害惟松陽為甚，麗水次之。兵戈之後，繼以瘟疫，死者累累。」<sup>163</sup>瘟疫流行相當劇烈，在松陽，「瘟疫陡作，死亡枕藉，有死十之三四者，有死過半者，有全家無一存者，間有未至如是之甚者，折贏補絀，計之十亦去四五矣。」龍遊的疫情也十分嚴重，「同治元年自四月至於八月大疫，日死數百人，十家九絕。」另有記載稱：「咸豐季年遭兵凶者半，疾疫者半，靡有孑遺。」<sup>164</sup>諸暨、衢縣、麗水、常山和開化等縣，是年也都有疫情發生。

上述記載表明，同治元年甯國、徽州、湖州、處州和衢州等府，爆發一次相當劇烈的傳染病流行。今宣州人劉永濂認為：「據《宣城縣誌》記載的『鼠白日出洞，不畏人』，『塘壩邊，死鼠相枕藉』等資料看，這場大瘟疫，很可能是鼠疫。」<sup>165</sup>遍查現存各種版本的《宣城縣誌》，並不見有死鼠的記載。<sup>166</sup>光緒《宣城縣誌》記載同治二年宣城發生「鼠災」。<sup>167</sup>在 1959-1961 年，在鄰近該地區的蕪湖，由於饑餓，同樣發生了鼠類成群移動的現象。由此推論，同治二年的鼠災同樣是由於饑餓而導致鼠類成群覓食，並不能據此斷為鼠疫。由於無法找到劉永濂引文的原始出處，只能據此做一推測。鼠類因饑餓而大量死亡，民眾往往並不能明確區分鼠疫和古典型霍亂，有可能誤將鼠死當作鼠

<sup>163</sup> 趙鈞，〈過來語〉，《近代史資料》，號 41(1980)，頁 200。

<sup>164</sup> 余恩鏞，〈續刻勳志書屋文詩稿自序〉，余紹宋修纂，《龍遊縣誌》（民國十四年鉛印本），卷 36，〈文徵四〉。

<sup>165</sup> 劉永濂，〈我國近代江南地區的移民活動〉，《安徽史志通訊》，1983 年第 1 期；轉引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安徽省宣城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宣城縣文史資料》，1986 年第 2 期，頁 96-98。

<sup>166</sup> 2001 年 5 月，筆者曾去宣州調查，得知劉氏業已故去，因而已無法得知劉氏引文的出處。筆者又訪得曾擔任當地衛生防疫站站長的徐繼光醫生，他曾在〈宣城歷代疫病流行情況概述〉一文中轉引這一條史料，他說此條資料引自劉氏的論文。

<sup>167</sup> 李應泰等修，章綬等纂，《宣城縣誌》（光緒十四年刊本），卷 36，〈祥異〉。

疫。<sup>168</sup>從江南、皖南地區疫情發生時間的一致性、傳染性強以及死亡人口等方面推測，這些地區流行的傳染病很可能是古典型霍亂。

自 1817 年開始，每隔數十年，古典型霍亂便會發生全國性的大流行。這種傳染病傳染性相當強，加之民眾缺乏免疫力，故而即使在和平時期，病死率也極高。<sup>169</sup>同治元年的古典型霍亂大流行發生在戰爭後期，免疫機能嚴重下降的民眾大量罹難。古典型霍亂對當地人口的巨大影響，從地方誌的記載也可以看出來。例如在昆山，「同治元年，疫癘大行，有全家病歿者，瑣尾流離，至斯為極。」<sup>170</sup>在句容，「同治元年七月大江以南疫癘流行，句容遺民死者殆盡。」<sup>171</sup>從發生背景考慮，這些記載並不能當成是文人的誇大之詞，而是真實情況的反映。

同治二年，江南地區仍有古典型霍亂。這年上海的古典型霍亂流行依然十分嚴重，伍連德稱：「患者甚多，及六月下旬，已成燎原之勢，有增無已，至七月中，其勢始殺。」<sup>172</sup>沈梓的記載是：「聞上海時疫流行，死者二萬餘人。」<sup>173</sup>吳江「（八月）初六日，市上稍有貿易，人家亦漸遷回，各處時疫流行，死者甚多；然擡柩無人，諸物不備。」<sup>174</sup>從「各處時疫流行」的記載來看，該種急性傳染病的流行區域是很廣的。常熟這年六七月間，「瘟疫大作，人死甚眾。本處最輕，病者甚多。」<sup>175</sup>海寧的疫情可斷為古典型霍亂，據記載：「米價復貴，斗米千錢，絡繹餓死，人又遭時疫（吊腳痧），亦傷無計。」<sup>176</sup>從是年江

<sup>168</sup> 李玉尚，〈近代民眾和醫生對於鼠疫的觀察與命名〉，《中華醫史雜誌》，2002 年第 3 期，頁 173-178。

<sup>169</sup> 李玉尚，〈霍亂在中國的流行(1817-1821)〉，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第 17 輯，頁 316-336。

<sup>170</sup> 吳金瀾等修，汪墮等纂，〈《昆新兩縣續修合誌》（光緒六年刊本），卷 51，〈祥異〉。

<sup>171</sup> 張紹棠修，蕭穆纂，〈《續句容縣誌》（光緒三十年刊本），卷 19 下，〈兵事月日表〉。

<sup>172</sup> 伍連德，〈霍亂概論〉，頁 10。

<sup>173</sup> 沈梓，〈避寇日記〉，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4，頁 294。

<sup>174</sup> 倦圃野老，〈庚癸紀略〉，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太平天國資料》，頁 112。

<sup>175</sup> 佚名，〈庚申避難日記〉，收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冊 4，頁 599。

<sup>176</sup> 馮氏，〈花溪日記〉，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冊 6，頁 710。

南地區留下的資料和記載的內容上判斷，和同治元年相比，同治二年江南地區的霍亂流行並不是特別地嚴重。

流行蘇南地區的古典型霍亂溯江而上，傳染至皖南北部和贛東北地區。宣統《建德縣誌》記載：「同治二年秋，民得麻足病，半日即死。」<sup>177</sup>麻足病即麻腳瘟，「又名黑痧症、蒲痧瘟、吊腳瘟。」<sup>178</sup>范行准對「麻腳瘟」的解釋是「從腳心麻至膝上者」，他根據「麻腳瘟」和大量的人口死亡，認為在十六世紀中國就有古典型霍亂流行。<sup>179</sup>古典型霍亂繼續沿江而上，傳染至江西九江府和饒州府。是年彭澤「瘟疫流行，死者無算」；<sup>180</sup>湖口「流賊竄入，橋民多逃亡殍死，秋大疫。」<sup>181</sup>贛北古典型霍亂的傳入是由軍隊帶入，這可以從鄱陽縣的記載中得到證明，同治《鄱陽縣誌》記載：「同治二年三月初四，發逆入寇，西中各鄉居民避賊逃竄，未及播種，米價騰貴，斗米至錢七百文。七月初旬賊始退，被賊各村夏大疫，死亡相繼，所存十無一二。」<sup>182</sup>由於太平軍的餘部在這一地區流動作戰，古典型霍亂的影響力比同一時間的江南地區要嚴重得多。同治《湖口縣誌》記載：「七月賊退，自夏徂秋，賊凡焚村舍數千，擄殺男婦三萬餘口，沿途骸齒疫氣傳染，逃亡病餓死者又萬七八千人，廬舍丘墟田園榛莽。」<sup>183</sup>

贛北的霍亂流行影響到軍隊的戰鬥力。如在鄱陽，這年五月初，「李公榕兵到（鈞字營五營），麾下鄭陽和等皆舊從鮑軍門者，最有聲，值天氣炎熱，兵多病疫，力弱不能戰。」<sup>184</sup>不僅如此，太平天國戰爭中，贛北地區的人口死亡遠大於江西其他地區，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同治二年的古典型霍亂流行。

<sup>177</sup> 張贊巽、張翊六修，《建德縣誌》（宣統二年刊本），卷 20，〈祥異〉。

<sup>178</sup> 道光《安平縣誌》，卷 1；轉引自貴州省圖書館編，《貴州歷代自然災害年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頁 379。

<sup>179</sup> 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頁 245。

<sup>180</sup> 殷禮等修，周謨等纂，《彭澤縣誌》（同治十三年刊本），卷 18，〈祥異〉。

<sup>181</sup> 陳友善修，歐陽壽等纂，張經畬補纂，《湖口縣誌》（同治十二年刊本），卷 10，〈雜紀志〉。

<sup>182</sup> 陳志培修，王廷等纂，《鄱陽縣誌》（同治十年刊本），卷 21，〈災祥〉。

<sup>183</sup> 陳友善修，歐陽壽等纂，張經畬補纂，《湖口縣誌》（同治十二年刊本），卷 5，〈武備志〉。

<sup>184</sup> 張宿煌，〈備志紀年〉，《近代史資料》，號 34(1964)，頁 193。

鼠疫、天花傳染的區域有限，因而只對局部地區產生影響。古典型霍亂則顯得與眾不同，它在戰爭的後期傳入，並在戰區普遍流行，對於免疫機能已經大大下降的民眾，這一疾病是毀滅性的。傳染病強、病死率高的古典型霍亂，使戰爭的烈度大大加強。

## 五、結 論

太平天國戰爭中的傳染病，延長了戰爭的時間，擴大了戰爭的規模，加強了戰爭的烈度，從而對太平天國戰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從軍隊流行病學來看，一場戰爭的將領，既要率領軍隊同看得見的敵人作戰，又要與看不見的病原體作戰。太平天國戰場上的各支軍隊在和病原體的戰鬥中，都無法取得勝利。傳染病在雙方軍隊中普遍流行，不僅使軍隊大量減員，而且影響了戰爭進程。

傳染病也對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戰爭的規模擴大。戰爭加劇了戰前環境、病原體和人之間原本就不平衡的關係。來自不同省份的軍隊進行跨省區軍事移動，當由低瘧區進入高瘧區，或因長期征戰而使機體免疫功能下降時，就容易使瘧疾、痢疾和其他當地常見病呈現爆發流行之勢。戰爭也干擾了住民的生活環境，城市居民被迫進行長距離遷移或者避居鄉村，鄉村人口不得不避難於山區或者周圍地區，這使他們進入一個新的環境當中，容易受到常見病的侵襲；大亂之後的大荒和流亡，使民眾機體免疫功能大大降低，也極易感染常見病。與此同時，戰爭導致戰區環境惡劣、田地荒蕪和牲畜減少，一些病原體和傳播媒介的活動力大大加強，瘧疾和痢疾等普通傳染病的發病率和病死率因此大為提高。

儘管這種干擾使戰區常見的傳染病危害加劇，但瘧疾、痢疾、傷寒、回歸熱等傳染病的傳染性並不是特別強，病死率也不高。當戰爭干擾了鼠疫自然疫源地時，鼠疫對於局部地區的影響是致命的。當同治初年古典型霍亂傳入戰區，並在戰區普遍流行時，機體免疫功能已經大大下降的民眾，所面對的將是

一場巨大的災難。霍亂對戰區中的軍隊和民眾，產生的影響是毀滅性的。烈性傳染病的爆發或者傳入，使戰爭的烈度大大加強，也使太平天國戰爭成為當時世界性災難的一部份。在太平天國戰爭中，長江中下游地區約損失 7,000 萬人口，以皖南和雲南傳染病死亡人口佔全部人口損失的比例計算，則瘧疾、痢疾等當地常見傳染病，以及鼠疫、古典型霍亂造成近 5,000 萬的人口死亡。

戰爭不僅是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對抗，而且是各種生態因素的相互作用。戰爭的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於此可窺見一斑。

附表 太平天國時期贛、皖、蘇、浙地區主要疫區

年份	州縣	府州	資料來源
咸豐五年(1855)	青浦	松江	光緒《青浦縣誌》，卷29，〈雜記〉
咸豐六年(1856)	鎮洋	太倉	宣統《太倉州鎮洋縣誌》，卷26，〈祥異〉
咸豐六年(1856)	潛山	安慶	民國《潛山縣誌》，卷29，〈祥異〉
咸豐七年(1857)	霍邱	六安	光緒《霍邱縣誌》，卷15，〈藝文志六〉
咸豐七年(1857)	穎上	穎州	同治《穎上縣誌》，卷12，〈雜誌·祥異〉
咸豐七年(1857)	廬江	廬州	光緒《廬江縣誌》，卷16，〈雜類志·祥異〉
咸豐七年(1857)		皖北	〈皖樵紀〉
咸豐七年(1857)		溫州	〈過來語〉
咸豐八年(1858)	仙居	台州	光緒《仙居誌》，卷24，〈雜誌·災變〉
咸豐八年(1858)	麗水	處州	光緒《處州府誌》，卷25，〈祥異〉
咸豐八年(1858)	霍山	六安	光緒《霍山縣誌》，卷15，〈雜誌·祥異〉
咸豐八年(1858)	六安	六安	同治《六安縣誌》，卷55，〈祥異〉
咸豐八年(1858)	嘉善	嘉興	光緒《嘉善縣誌》，卷34，〈祥書〉
咸豐九年(1859)		南昌	同治《南昌府誌》，卷65，〈雜類·祥異〉
咸豐十年(1860)	五河	泗州	光緒《五河縣誌》，卷19，〈雜誌四·祥異〉
咸豐十年(1860)	烏鎮	嘉興	〈避寇日記〉
咸豐十一年(1861)	廬江	廬州	光緒《廬江縣誌》，卷16，〈雜類志·祥異〉
咸豐十一年(1861)	六安	六安	同治《六安縣誌》，卷55，〈祥異〉
咸豐十一年(1861)	五河	泗州	光緒《五河縣誌》，卷19，〈雜誌四·祥異〉
咸豐十一年(1861)	貴池	池州	光緒《貴池縣誌》，卷43，〈雜類志·祥瑞〉
同治元年(1862)	上海	松江	同治《上海縣誌》，卷31，〈祥異〉
同治元年(1862)	奉賢	松江	民國《奉賢縣誌》，卷20，〈雜誌〉
同治元年(1862)	川沙	松江	民國《川沙縣誌》，卷1，〈大事年表〉
同治元年(1862)	奉賢	松江	光緒《奉賢縣誌》，卷末，〈述異〉
同治元年(1862)	婁縣	松江	光緒《婁縣誌》，卷12，〈祥異志〉
同治元年(1862)	金山	松江	光緒《金山縣誌》，卷17，〈志餘〉
同治元年(1862)	常熟	蘇州	《漏網鳴魚集》
同治元年(1862)	吳江	蘇州	〈庚癸紀略〉
同治元年(1862)	蘇州	蘇州	《太平天國史料專輯》
同治元年(1862)	句容	江寧	光緒《續句容縣誌》，卷19上，〈祥異〉



年份	州縣	府州	資料來源
同治元年(1862)	溧水	江寧	光緒《溧水縣誌》，卷1，〈天文志·庶徵〉
同治元年(1862)	江浦	江寧	光緒《江浦埤乘》，卷39，〈雜記上〉
同治元年(1862)	通州	通州	光緒《通州直隸州誌》，卷末，〈雜紀·祥異〉
同治元年(1862)	嘉善	嘉興	光緒《嘉善縣誌》，卷34，〈祥眚〉
同治元年(1862)	新塍	嘉興	〈避寇日記〉
同治元年(1862)	昌化	杭州	民國《昌化縣誌》，卷15，〈事類·災祥〉
同治元年(1862)	臨安	杭州	宣統《臨安縣誌》，卷1，〈輿地志·祥異附〉
同治元年(1862)		杭州	民國《杭州府誌》，卷84，〈祥異三〉
同治元年(1862)	諸暨	紹興	光緒《諸暨縣誌》，卷18，〈災異志〉
同治元年(1862)	開化	金華	光緒《開化縣誌》，卷14，〈通考三·詳異〉
同治元年(1862)	常山	衢州	光緒《常山縣誌》，卷8，〈祥異〉
同治元年(1862)	衢縣	衢州	民國《衢縣誌》，卷1，〈象緯志·五行〉
同治元年(1862)	龍遊	衢州	民國《龍遊縣誌》，卷1，〈通紀〉
同治元年(1862)	麗水	處州	光緒《處州府誌》，卷25，〈祥異〉
同治元年(1862)	松陽	處州	〈過來語〉
同治元年(1862)	宣城	甯國	光緒《宣城縣誌》，卷40，〈續補遺〉
同治元年(1862)	甯國	甯國	民國《甯國縣誌》，卷10，〈武備志·兵事〉
同治元年(1862)	太平	甯國	《太平續誌·人物類》
同治元年(1862)	廣德	廣德	光緒《廣德州誌》，卷58，〈祥異〉
同治元年(1862)	石埭	池州	民國《石埭備志彙編》，卷1，〈大事記稿〉
同治元年(1862)	安義	南康	同治《南康府誌》，卷23，〈雜類·祥異〉
同治二年(1863)	吳江	蘇州	〈庚癸紀略〉
同治二年(1863)	常熟	蘇州	〈庚申避難日記〉
同治二年(1863)	海寧	嘉興	〈花溪日記〉
同治二年(1863)	富陽	杭州	光緒《富陽縣誌》，卷15，〈風土·祥異〉
同治二年(1863)	諸暨	紹興	光緒《諸暨縣誌》，卷18，〈災異志〉
同治二年(1863)	開化	金華	光緒《開化縣誌》，卷14，〈通考三·祥異〉
同治二年(1863)	浦江	金華	光緒《浦江縣誌》，卷15，〈祥異〉
同治二年(1863)	湯溪	金華	民國《湯溪縣誌》，卷1，〈編年〉
同治二年(1863)	蘭溪	金華	光緒《蘭溪縣誌》，卷8，〈祥異〉
同治二年(1863)	江山	金華	同治《江山縣誌》，卷12，〈拾遺三·祥異〉
同治二年(1863)	永康	衢州	光緒《永康縣誌》，卷11，〈祥異〉
同治二年(1863)	分水	嚴州	光緒《分水縣誌》，卷10，〈雜誌〉

年份	州縣	府州	資料來源
同治二年(1863)	彭澤	九江	同治《彭澤縣誌》，卷18，〈祥異〉
同治二年(1863)	湖口	九江	同治《湖口縣誌》，卷10，〈雜紀志·祥異〉
同治二年(1863)	鄱陽	饒州	同治《鄱陽縣誌》，卷21，〈災祥〉
同治二年(1863)	新城	建昌	同治《江西新城縣誌》，卷1，〈星野〉
同治二年(1863)	建德	池州	宣統《建德縣誌》，卷20，〈祥異〉
同治三年(1864)	靖江	常州	光緒《靖江縣誌》，卷8，〈禳祥〉
同治三年(1864)	建德	嚴州	同治《建德縣誌》，卷1，〈祥異〉
同治三年(1864)	江山	金華	同治《江山縣誌》，卷12，〈拾遺三·祥異〉
同治三年(1864)	廬江	廬州	光緒《廬江縣誌》，卷16，〈雜類志·祥異〉
同治三年(1864)	南城	建昌	同治《南城縣誌》，卷10之2，〈祥異〉
同治三年(1864)	金溪	撫州	同治《金溪縣誌》，卷14，〈兵氛〉
同治三年(1864)	貴溪	廣信	同治《貴溪縣誌》，卷13，〈雜類·祥異〉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

《上海新報》。上海，1862。

《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編，《中國兵書集成》。北京和瀋陽：解放軍出版社和遼瀋書社，1992。

《申報》。上海，1874。

丁燮等修，戴鴻熙等纂，《湯溪縣誌》，民國二十年刊本。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安徽省宣城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宣城縣文史資料》，1986年第2期。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建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建甌文史資料》，第11輯。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7。

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54、1955、1963、1980。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太平天國資料》。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中華文史論叢編輯部編，《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北京：中華書局，1962。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方懋祿等修，夏三翰纂，《新城縣誌》，同治十年刊本。
- 方鴻鎧修，黃炎培纂，《川沙縣誌》，民國二十五年刊本。
- 王祖畚纂修，《太倉州鎮洋縣誌》，民國八年刊本。
- 王崇武、黎世清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
- 王彬等修，朱寶慈等纂，《江山縣誌》，同治十二年刊本。
- 王壽頤等修，王棻等纂，《仙居誌》，光緒二十年刊本。
- 王慶成，《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
- 王蘭生等纂，《潛山縣誌》，民國九年刊本。
- 左宗棠，《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 石文光，《南京軍區衛生工作 40 年(1949-1989)》。內部印行本，1993。
- 石文志、伏斟，《解放戰爭時期華東部隊衛生工作簡史》。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86。
- 朱從亮，《南潯文獻新志紀餘》。內部印行本。
- 江峰青修，顧福仁纂，《嘉善縣誌》，光緒二十年刊本。
- 余紹宋修纂，《龍遊縣誌》，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 余誼密修，徐乃昌等纂，《南陵縣誌》，民國十三年刊本。
- 吳汝綸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 吳克俊等纂，《歙縣誌》，民國十二年刊本。
- 吳金瀾等修，汪墜等纂，《昆新兩縣續修合誌》，光緒六年刊本。
- 吳炳權修，鄧應台等纂，《金溪縣誌》，同治九年刊本。
- 李人鏡修，梅體萱纂，《南城縣誌》，同治十二年刊本。
- 李 圭，《金陵兵事匯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 李汝爲等修，潘樹棠等纂，《永康縣誌》，民國二十一年重印本。
- 李瑞鍾等纂修，《常山縣誌》，光緒十二年刊本。
- 李蔚等修，吳康霖纂，《六安縣誌》，光緒三十年刊本。
- 李應泰等修，章綬等纂，《宣城縣誌》，光緒十四年刊本。

- 汪文炳等修纂，《富陽縣誌》，光緒二十八年刊本。
- 汪坤厚等重修，張雲望等纂，《婁縣誌》，光緒五年刊本。
- 侯宗海修，夏錫寶纂，《江浦埤乘》，光緒十七年刊本。
- 南京大學歷史系太平天國研究室編，《江浙豫皖太平天國史料選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 柯悟遲，《漏網喁魚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
- 胡有誠等修，丁寶書等纂，《廣德州誌》，光緒七年刊本。
- 胡長齡，《儉德齋隨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 夏日璈等修，《建德縣誌》（浙江），民國八年重新影印本。
- 夏辛銘纂，《濮院志》，民國十六年刊本。
- 徐名立等修，潘樹棠纂，《開化縣誌》，光緒二十四年刊本。
- 殷禮等修，周謨等纂，《彭澤縣誌》，同治十三年刊本。
- 泰簧修，唐壬森纂，《蘭溪縣誌》，光緒十四年刊本。
- 秦達章修，何國佑等纂，《霍山縣誌》，光緒三十一年刊本。
- 張文虎，《張文虎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 張紹棠修，蕭穆纂，《續句容縣誌》，光緒三十年刊本。
- 張贊巽、張翊六修，《建德縣誌》（安徽），宣統二年刊本。
- 盛元纂修，《南康府誌》，同治十二年刊本。
- 許應等修，曾作舟等纂，《南昌府誌》，同治十二年刊本。
- 陳友善修，歐陽壽等纂，張經畚補纂，《湖口縣誌》，同治十二年刊本。
- 陳汝霖修，王棻等纂，《太平續誌》，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 陳志培修，王廷等纂，《鄱陽縣誌》，同治十年刊本。
- 陳其元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縣誌》，光緒五年刊本。
- 陳周棠，《廣東地區太平天國史料選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 陳培璉等修，許昌言等纂，《昌化縣誌》，民國十三年刊本。
- 陳惟壬等纂，《石埭備志彙編》，民國三十年刊本。

- 陳當鏞修，臧承宣等纂，《分水縣志》，光緒三十二年刊本。
- 陳遙聲修，蔣鴻藻纂，《諸暨縣志》，宣統二年刊本。
- 陸延齡修，桂迺衡等纂，《貴池縣志》，光緒九年刊本。
- 陸鼎敷等纂修，《霍邱縣志》，同治九年刊本。
- 彭循堯修，董運昌纂，《臨安縣志》，宣統二年刊本。
-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善廣修，張景青纂，《浦江縣志》，民國五年黃志璠再增補本。
- 貴州省圖書館編，《貴州歷代自然災害年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
- 黃秩冲，《行軍臆說》。虔州：出版者不詳，1872。
- 傅觀光等修，丁維誠等纂，《溧水縣志》，光緒九年刊本。
- 楊虎修，李丙龔纂，《甯國縣志》，民國二十五年刊本。
- 楊長傑等修，黃聯珏等纂，《貴溪縣志》，同治十一年刊本。
- 楊開弟修，姚光發等纂，《通州直隸州志》，光緒二年刊本。
- 葉滋森等修，褚翔等纂，《靖江縣志》，光緒五年刊本。
- 鄒永禧等修，《衢縣志》，民國二十六年刊本。
- 劉濬修，潘宅仁纂，《孝豐縣志》，光緒三年刊本。
- 廣西通志館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61。
- 潘紹詒修，周榮椿纂，《處州府志》，光緒三年刊本。
- 鄭鍾祥等修，鹿鴻文等纂，《常昭合誌稿》，光緒三十年刊本。
- 賴同晏等修，俞宗誠等纂，《重修五河縣志》，光緒二十年刊本。
- 錢山榮修，俞燮奎等纂，《廬江縣志》，光緒十一年刊本。
- 錢 勛，《吳中平寇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 靜吾仲丁編，《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
- 應寶時修，俞樾纂，《上海縣志》，同治十一年刊本。
- 韓佩金修，張文虎纂，《奉賢縣志》，光緒四年刊本。

龔嘉儻修，李榕纂，《杭州府志》，民國十一年刊本。

龔寶琦等修，黃厚本等纂，《金山縣誌》，光緒四年刊本。

Health Officer's Report, "Annual Report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873,"  
上海檔案館藏 U1-16-4704.

Macgowan,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Ningpo for 1856 and 1857,"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for the Years 1858 and 1859*. Macao,  
1860.

## 二、論文

王吉民、趙士秋，〈太平天國期間在清廷雇傭軍裡的兩個外籍軍醫〉，《中華醫史雜誌》，1955年第1期，頁29-30。

王豐、李中清，〈摘掉人口決定論的光環——兼談歷史人口研究的思路與方法〉，《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頁55-61。

余新忠，〈清代江南瘟疫對人口之影響初探〉，《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2期，頁36-43。

吳良祚，〈太平天國前期的醫官設置〉，《中華醫史雜誌》，1985年第2期，頁96-98。

吳良祚，〈太平軍的衛生工作〉，《中華醫史雜誌》，1981年第3期，頁141-143。

巫仁恕，〈戰爭與疾疫：抗戰後期的疫情與疫政(1940-1946)〉，《中華軍史學會會刊》，期3，1997，頁321-364。

李玉尚，〈霍亂在中國的流行(1817-1821)〉，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第17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李玉尚、曹樹基，〈咸同年間的鼠疫流行與雲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頁19-32。

李玉尚，〈近代民眾和醫生對於鼠疫的觀察與命名〉，《中華醫史雜誌》，2002年第3期，頁173-178。

- 唐志炯，〈太平天國時期之衛生工作考〉，《中華醫史雜誌》，1953 年第 3 期，頁 141-144。
- 耿鑑庭，〈太平天國醫林人物傳〉，《中華醫史雜誌》，1954 年第 3 期，頁 176-179。
- 耿鑑庭，〈太平天國時期的醫藥史料〉，《中華醫史雜誌》，1955 年第 3 期，頁 193-195。
-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 年）〉，《歷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17-32。
- 葛慶華，〈太平天國戰後「下江南」移民的類型與動因——以蘇浙皖交界地區為中心〉，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第 17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謝高潮，〈淺談同治初年蘇浙皖的疫災〉，《歷史教學問題》，1996 年第 2 期，頁 18-22。
- Chang, Chia-Feng “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57:2, April 2002, pp. 161-176.
- Simmons, D. B. “Cholera Epidemics in Japan,” *China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No.18, 1879.

### 三、專書

- 上海衛生局編，《中醫中藥臨床實驗彙編》。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8。
- 于伯海主編，《傷寒金匱溫病名著集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
- 王向東，《戰爭與疾病》。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3。
- 皮特·布魯克史密斯(Peter Brooksmith)著，馬水波譯，《未來的災難：瘟疫復活與人類的生存之戰》。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 伍連德，《霍亂概論》。上海：海港檢疫管理處，1937。
- 朱克文、高恩顯、龔純，《中國軍事醫學史》。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6。



- 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 南京大學歷史系太平天國史研究室編，《太平天國史新探》。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 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
- 浙江省衛生廳編，《浙江省中醫藥臨床經驗彙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
- 曹炳章編，《中國醫書大成》。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
-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卷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卷6。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陳方之，《傳染病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50。
-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 黃玉蘭，《實用臨床傳染病學》。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0。
-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卷1。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葛慶華，《近代蘇浙皖交界地區人口遷移研究(1853-191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 廣東太平天國史學會和廣西太平天國史學會編，《太平天國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 羅爾綱，《困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蘇北人民醫院中醫內科編，《任繼然臨床經驗錄》。揚州：揚州人民出版社，1960。
- Pollitzer, R. *Choler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59.
- Prinzling, Friedrich. *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the Wa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6.

## The Effect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Li Yushang<sup>\*</sup>

### Abstract

The Taiping Rebell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greatest war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ut how did infectious diseases affect military actions and the population during the war? Research has thus far failed either to explain the issues fully or has even denied the standard views of medical scholars.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not only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 but also to discuss how and what kind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ffected the populations in Taiping-controlled areas. Through this model case, we further try to explain historical instances of the “great rise and fall” in Chinese demography.

Infectious diseases grea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the soldiers in the army, affected the progress of the war, and prolonged the war, especially in the reign of Tongzhi when the epidemic disease cholera had a dramatic effect on the course of the war.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also the main factor behind the war’s death toll. Acute contagious diseases such as malaria, diarrhea, and typhoid fever were aggravated by the war, but their rates of infection were not very high and so their death rate remained relatively low. Similarly, severe infectious diseases intensified the war, but plague and smallpox only infected a few areas. However, classical biotype cholera was quite different. It began to spread in the latter stages of the war

---

\* Institute for Maritime Culture Studi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became an epidemic in war zones. It had a destructive effect on the people whose immune systems were already weakened. According to the rural legends of the Wannan Area, it was a general rule that in major wars the population would be drastically cut—70 percent dying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totalling some 40 percent of the total local population before the war.

**Keywords: infectious diseases, war process, death tolls, effects**